

漲薪之後的剝奪與排除-

富士康*工人的都市狀況**

Exploitation and Exclusion: Foxconn Workers' Urban Condition Following Wage Hike

夏鑄九*** 趙慧琳****

Chu-joe Hsia & Hui-Lin Chao

摘要

幾十萬農民工充作底層勞動力的深圳富士康廠，既是全球最大的電子製造業工廠，也是美國蘋果公司最大海外代工廠。它的龐大規模，使得廠區建成，宛如城市生成；工廠經營，亦形同一座城市的治理。本研究檢視富士康龍華廠區的工人都市狀況，從整個“富士康市”所提供的個人消費與都市服務，分析他(她)們的勞動力社會再生產，從中指認出資訊社會下“血汗勞工”的當代變貌。

從富士康案例，可反省地方國家(the local state)角色和其在工人住房等集體消費問題上的放任政策。農民工沒有能力進入住宅市場完成商品消費，他們不是入住宿舍，就是成為城中村的承租者。前者，工業資本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住房的壟斷供應者；宿舍既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有效管理工具，又是馴訓(discipline)二代農民工的空間。後者，城中村的超標建築密度、公共設施不足，都讓富士康勞工在社會排除下，成為斷裂城市的空間碎片。富士康工廠及周邊城中村是快速形成的龐大聚落，卻是沒有市民的城市。

甚且，深圳地方政府為了產業轉型而推進的城市規劃，已誘發都市非正式部門的邁向正式化，以及工人鄰里高級化。如此富士康都市地景上階級重組的社會趨勢，正在加速深圳“世界工廠”的整體空間再結構。富士康資方回應“血汗工廠”質疑，高調實施漲薪、內遷分流以後，農民工們反倒陷入了排除加深的更極化都市狀況。

關鍵詞：農民工、都市集體消費、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工人住房政策、富士康宿舍、城中村

* 富士康科技集團(Foxconn Technology Group)的簡稱。

** 論文修改前曾發表於勞資關係與社會和諧學術研討會，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與學術研究主辦，安徽黃山，2011年11月5日。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hchujoe@ntu.edu.tw，2011年國科會研究案“深圳富士康勞工的住宅狀況——馴訓空間與空間碎片”計畫主持人。Hsia, Chu-joe: Professor Emeritus,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d97544001@ntu.edu.tw，本文的通訊作者。Chao, Hui-Li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研究團隊從2011年8月27日至9月06日期間，在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周圍進行工人訪談及城中村空間調查，研究團隊成員：黃舒楸、林依陵、曾惠君、黃映翎、余映嫻、董彥希。

ABSTRACT

Foxconn factory, Apple's essential overseas manufacturer as well as the world's largest one of electrical components (notably electrical connectors for computer components), more than 450,000 workers are employed at the Longhua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 in Shenzhen,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Foxconn City". The peasant workers are the major labor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urban condition of these Foxconn workers, analyzing their social reproduction in terms of the individual consumption and urban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Foxconn City" as a whole. And eventually it is identified as a contemporary mutation of "sweatshop labor"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It might provide a reflexive perspective on *laissez-faire* policies of housing, also any other kind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s well the role of local state through Foxconn case study. The peasant workers are incapable to enter into the housing market for housing commodity consumption. They either live in dormitory or become a tenant of "chengzhongcun" (urban villages, literally: villages in city). The former, the industrial capital is the monopoly supplier of housing of peasant workers. The dormitory is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tool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 but also the disciplined space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 labor. The latter, the heavily populated density and lack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chengzhongcun" make Foxconn labor as the fragmented space in splintering urbanism under social exclusion. The mega settlements in a rapi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xconn factories and surrounding "chengzhongcun" are the cities without citizens.

Evermore the Shenzhen government's city planning, purposely for the push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as induced the gradual formalization of urban informal sectors and the ongoing gentrification of labor neighborhood. Such a social tendency of class recompose upon Foxconn urban landscape, is speeding up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Shenzhen "world factory" as a whole. And when the Foxconn capitalist promptly responds to the public accusation of "sweatshop", by adding the basic wage for their peasant labors, there is meanwhile a counter development of moving their factories to the inland cities of China. Thus they all together have made the peasant labors trapped into a much more exclusive and polarized urban condition.

Keywords: peasant labor, urban collective consump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of labor, housing policy, Foxconn dormitories, "chengzhongcun" (urban villages)

前言

「作為作業員內心沒有感到驕傲。都是一種浮沉。值得驕傲是我們這個月發了多少工資。[至於]工廠做出了甚麼產品，跟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打工的，要有多一點錢就行。」(註 1)

這是一名富士康打工仔率真的告白。即便深圳富士康宣稱，普工(註 2)薪資漲幅接近 100%，基層工人還是瀕臨親子離散，擺脫不了都市貧窮線上載浮載沉的命運？

2011 年 8 月 27 日，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團隊抵達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周邊，展開為期十天的工人訪談與空間調查。一年多前，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總部所在的這座廠區，一度成為媒體焦點。又當這公共驚悚事件逐漸為社會所淡忘，龍華廠區也被忽略了。此際，該廠二度調漲工人薪資(註 3)，即將屆滿一年；富士康內遷的生產地理擴張，

正積極進行，且它取而代之，成為新的輿論關注對象。

理應沉寂的深圳富士康，一點也不平靜。一方面，富士康往內陸城市遷移的企業決策，驅動龍華廠區三十萬資訊科技製造業大軍，形成勞動力四散的「分流」。另一方面，官方強調是「深港合作」里程碑的深圳地鐵四號線[龍華線]，在 6 月份全線開通，特區加速推動關內、關外一體化。包括富士康龍華廠在內的整個地區，可望編入「龍華新城」(註 4)，地方政府為了產業轉型而提出的城市規劃，則在催生一個具房市潛力的新興區段。

深圳富士康和周圍經濟、社會環境的急遽變化，讓我們更為確認以下研究取向：若要瞭解中國農民工的勞動處境，探討富士康跳樓員工面對的工廠體制，宜先認識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下的社會結構變遷。這是後工業年代的資訊社會(註 5)，中國數十萬代工人口形構勞工階級意識的都市過程。本報告基於這個研究主旨，將在勞工生產與勞動狀況的認識基礎

上(註 6)，分析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關注富士康工人在都市生活中，如何滿足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消費供給？這不但和勞資生產關係並行，更和具爭議性的農民工制度相互糾葛，是全球都會區域浮現下的新都市問題。

我們意圖闡述，當代未解的富士康管理爭議，既是單一工廠生產/勞動公平與否的勞資關係問題；也是中國沿海城市急遽城市化的都市治理問題。它是幾十萬農民工城鄉流動的生存權問題；還更是全球越界生產網絡中，獲利分配不均的冰山一角。因此若要檢驗富士康工人在工廠生產領域，勞動條件變化的確切意含，自是無法忽略掉和農民工的社會再生產密切相關，他(她)們每日生活的都市消費狀況。(比如，即使富士康普工的底薪倍增，我們仍無法判斷，它是否能夠滿足工人都市生活所需的集體/個人消費?) 這正是我們另闢都市研究的取徑，擴大調查富士康工人勞動生產與消費(社會再生產)關係的基本緣由。

換句話說，我們以參與觀察的都市民族誌方法，進入深圳富士康廠的工人生活現場，是為了揭露他(她)們的個人消費現實，以及如何取得都市集體消費與公共服務的最新狀況。我們認為透過這樣發問，才能檢視出富士康薪資調漲(註 7)，工人生產與勞動條件「改善」的實質意含。

人們對於「血汗工廠」的指控，一般或可理解為反對重度勞動剝削的同義詞。然而在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年代，高科技代工體系形塑勞動環境的管理技術，已出現更細膩演化。現今的反血汗工廠運動，若要揭露當代變種的「血汗」管理模式，勢必不能讓剝削事實的舉證，停滯在舊勞動結構與生產組織的想像之中。整體而言，那是連勞動立法的公平底線，也檢視不了高科技意識形態帶來的更深層勞動異化。它更查核不出資訊社會裡，使得工人社群更為孤立與脫落的時間-空間控制網絡。

更何況，「血汗工廠」本身是個涉及了權力競奪的論述。當它牽連到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下的越界生產網絡，就不能讓解秘分析，只環繞在富士康農民工進廠，眼目可見的微觀生產組織與條件，以及拘囚他/她們的整座世界工廠勞動環境。富士康作為「蘋果」最大的世界代工廠，並不是美國工廠複製品；也不會只是多國公司製造業外包的產業殖民地；更不應該淪為西方人想像底下，「東方」的「中國製造」之投射。去地方政治和經濟脈絡；去都市文化與社會地景的勞工處境解釋，恐將全球商品鏈最下游的中國底層工人，揣想為工作、居住與生活在無歷史、無地方社會、無城鄉二元的空間流動記憶，以及完全不被特定國家政經體制所驅動的

的真空下存有。

我們若有效進行「血汗工廠」的當代再論述，揭露現今「血汗」勞動體制的實質建構，或可擴大至工廠體制歷史-社會地座落的整個都市領域。當我們將剝削概念還原到勞資階級的緊張關係。一個動態過程的階級剝削，不僅存在於工作場所之中。除了工廠生產領域的剝削，還有都市消費領域裡，支配階級對於薪資勞工日常生活持續的剝削。馬克思與恩格斯理論中所指涉的第二種形式的剝削(the secondary forms of exploitation)，恰可佐證都市消費領域中，階級剝削驅力強大的實存。它意味的是商業資本家、地主和金融家們作為都市資產階級中的主要行動者，如何在勞工階級每日生活的地方，透過消費供給的結構性壟斷，進一步加諸被支配階級身上，第二層粗暴的剝奪(註 8)。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即指出，都市化過程中的房地產市場便是都市日常剝削的關鍵。這一種剝削型態也主要是在生活的空間裡被感受到，而不是在工廠內。這樣形式的剝削更是資本積累動力以及支配階級維護既有權力的核心。資本家在薪資給付上對工人讓步，卻可以由同屬資本家階級的商業資本家、地主，以及當代狀況下更為邪惡的銀行、信貸部門及金融機構，聯合竊取而奪回(註 9)。

本研究於是追本溯源，生產、消費和都市，正是洞察當代工人社會不可或缺的三位一體。以富士康工人處境為例，深圳富士康廠的工廠營建過程，形同是資本積累(註 10)的慾望驅動下，當地城市建成的歷史；大量農民工租住、消費的城中村，也是「富士康市」快速都市化的社會產物。以迄富士康大舉內遷以後，深圳廠區的生產組織再結構，也對整個城市的社會-空間樣貌產生了立即性衝擊。

總括來說，這份調查報告必要檢視「富士康市」(註 11)中有關工人日常生活所需都市消費的供給，分析富士康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接著，我們方能對照它和工廠生產/勞動的相應關係，解釋勞資之間階級緊張關係，是否帶來勞動和消費的雙重剝削，而藉此重新界定，資訊社會「血汗勞工」的當代變貌。

一、富士康薪資調漲的管理政治

富士康將普工底薪調升為 2390 元人民幣。它的部分調幅是虛漲。比如富士康員工源源(註 12)質疑，調高的底薪把每個月 400 元的伙食費也算進去，形同「不再包吃」。何況廠內伙食也在龍華一帶的喊漲聲中，跟著提高了價格。她舉證：「現在廠內[餐廳]五元一份[幾乎]沒有了，至少八到九塊，什麼都提高了。加到好貴，例如：韭菜炒蛋，[貴了]兩元，看不

到雞蛋了，就看不到一點點。[其它菜也]看不到裡面的肉。一點點味道都沒有...。(註 13)」

普工小北也抱怨每日相關開銷的壓力：「本來[一餐固定]五塊五，現在自選，一餐至少十元。也有[一樣]五塊五[的菜可以選]，[但只有]水煮白菜，沒人吃。現在好像商業，不像是廠裡面大鍋飯，現在搞得像高檔餐一樣，消費不起。吃好一點的，不下十五元，最多一餐二十元，所以好多人不做了。[加上我]抽煙，一天消費挺大，最多一天三十元。我進廠四個月，[一個月]最多花一千八百，每個月[還要]扣七、八百 [含 110 宿舍費；社保卡繳費 120-130；住房公積金 110；飯卡 400]。」

倍漲的富士康普工底薪是有特定門檻，又輔以配套條件的工資調整設計，而不是進廠工人皆能享有的普及性薪資。普工底薪調高的基本條件，是要進廠屆滿九個月。那只是最低門檻。工人能否階段性調薪，最終仍取決於廠方管理部門單向的考核。譬如 iDSBG 事業群(註 14)的小尚，工作未滿六個月，底薪 1500 元人民幣，加班費計算在內，每月所得還辛苦徘徊在 1800 元上下。小尚認知裡，富士康變相的員工「試用期」長達九個月。他感慨：「差在要養家、養小孩。現在帶小孩，存不到積蓄。萬一有情況，手上沒有一點點錢，不好。」小尚的老婆美美則坦言：「寶寶的爸爸[一個月]一千多工資，有時還不夠花，要‘倒借’，跟一些朋友‘倒借’一、兩百塊。」

持續單身、無家累的原子化(註 15)勞工狀態，較有利於資方從事勞動力再生產的私有化投資。小尚是二度進廠的富士康作業員(註 16)。他辭工，回老家結婚，再帶著妻小回流都市生產線的社會模式，結果衍生出一家三口進城的總體生活需求，並不符合資本家的成本推算法則。2011 年 10 月初，我們團隊成員再訪深圳，做滿六個月的小尚，總算通過第一階段加薪的考核。他表示：「下個月發薪，可以多拿一百塊錢」。我們卻觀察到，才幾個月大的小尚寶寶，當天剃頭的時候，意外傷及頭皮，他們進社區健康中心裏傷取藥，一趟療程就花掉一百多塊。小尚階段性加薪，可謂杯水車薪。小尚的老婆憂心：「明天，還要帶寶寶去打流行性腦炎預防針，費用是九十八塊。之前，寶寶打進口的水痘疫苗，一針也花了三百多塊...。」

龍華廠工人普遍反映，富士康漲薪後，廠方透過車間人力調節和工作強度的管控，實質限制了加班工時(註 17)。普工在工作日加班，頂多一到兩個小時。以女工小紅為例，她先前在「黑廠」打工，經歷過每天站著工作二十個小時的極不人道待遇(註 18)，如今富士康生產線上的勞動總工時，因此讓她相對滿意。小紅是個未滿二十歲的單身女孩。

當我們瞭解她的薪資所得和生活消費狀況，仍察覺到二代農民工進城的結構性經濟困境。

家裡快收玉米了，很忙，沒寄[錢]，父母會問，發薪了沒？為何沒寄？只要不買太多衣服就可省許多錢。吃飯，廠裡刷卡，頭髮，半年做。不買衣服，夠了(註 19)！

小紅進富士康工作一個多月，加班時數累計二、三十個小時，總共掙得 2,200 人民幣。她自尊心強，領薪後的第一件事，是剛來的時候跟姐姐借了八百，連本帶利還她一千。小紅也寄了一千塊回家。結果她身上只剩下幾百塊，留給自己花用。從小紅如何三餐果腹的自述，可窺知富士康農民工除了在都市中養活自己，背後可能還有留守家鄉的老弱人口，仰賴他[她]支撐家計。他[她]們依舊是低薪資勞動下的生活消費，就注定和城市中的蠢蠢欲動的通膨拔河了。

她給自己限定的餐費，是晚餐三元，午餐五元。她午餐在廠裡吃，‘我就吃一道菜，五元’。剛進廠的時候，小紅還搞不清楚廠內餐廳的消費價格，揀了兩道菜，得多花六、七元，她決定不吃，就說要退菜。她說：‘時間長就懂，不用那麼多菜。’有的時候，她就在廠裡超市買麵包果腹。‘一大包[麵包]五、六元，吃不完，明天吃。’晚餐小紅就回到商場、宿舍附近吃。即使只是光顧路邊攤，她也必須斤斤計較，小心花費，否則，‘涼皮五元，加瓶涼水五元，十塊錢就沒有。’有時小紅就吃點兩、三元的餅，晚餐[這一頓飯就解決了] (註 20)。

二、蘋果的滋味？—品牌直接薪資補貼真相的檢視

即使富士康調漲了薪資，資方過度剝削的超時加班，依然是捲入消費漩渦的農民工們，現階段極力爭取的勞動狀況。小尚就不時苦惱著「現在加班少」(註 21)。他無奈：「我們這階段一般靠加班過日子。有加班才有[錢]。」小尚所屬事業群僅挑選重點車間的少數生產線，提供特惠的(exclusive)加班補貼制度，也讓他頗為不平。

我兩個老鄉也是 iDSBG 事業群的，他們在 DSD-MLB-SMT 事業處做的是蘋果的主板(PCB 板制作)。他們的加班，每天正常班 8 小時、加班 2 小時的薪資是富士康給的；...補貼加班的薪資則是蘋果公司給的。以前是[加班一小時補貼]2 個小時[的加班費]，現在是[加班一小時補貼]1.3 個小時[的加班費](註 22)。[老鄉]他們車間白夜班差不多有一、兩千人吧！在我們事業處也有這種，在我上班的那棟樓四樓，有一條線是試做新機種的，聽那裡的人說，他們[加班補貼]的工資是蘋果給的。而且他們有事

做，沒事做，都照樣有班上、有班加，我們要是沒有事做，就調休和不加班。

本研究解讀那是 2010 年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美國蘋果(Apple)公司回應輿論壓力，經董事會決議，對富士康代工的蘋果相關產品直接補貼，以提高生產線工人的工資待遇。2010 年 5 月，有媒體報導(註 23) iPad 是第一個實施代工補貼措施的蘋果產品，補貼額度為 iPad 利潤的 1% 至 2%。根據市調機構 isupply 針對售價 629 美元的 iPad 所進行的成本計算，蘋果公司支付代工廠商富士康的每台 iPad 組裝費，只有 11.2 美元，佔它零售價格的 1.78%。蘋果預計，增撥這項工資補貼後，每台 iPad 的代工組裝費，能夠提高到零售價格的 3%。簡言之，是上游客戶的蘋果資方，意圖將更高利潤直接再分配給下游代工廠聘雇的工人，富士康從事蘋果代工的少數車間，才出現了現今回饋機制。

蘋果單單補貼製造 iPad 主板與測試新機種的那幾條生產線勞工，是將參與 iPad 代工生產的多數工人排除在外的回饋模式。蘋果果真將 1%-2% 的 iPad 生產利潤，直接再分配給世界工廠的底層勞動者？以 2000 人民幣作為標準月薪計算，富士康龍華廠區 iDSBG 事業群負責生產 iPad 主機板的一、兩千名普工，估計一整年勞動下來，多取得的加班補貼費約計為九百三十六萬到一千八百七十三萬人民幣(約一百四十六萬美元到兩百九十二萬美元)(註 24)。

對於獲利不斐的蘋果公司來說，輿論期待的該企業讓利，只是「蠅頭小利」。即使富士康 iDSBG 事業群在龍華廠區的另一事業處，負責 iPad 新機種測試的全體工友，都獲得加班補貼；以及，分流到鄭州和重慶的部份 iDSBG 工人，也有同等待遇。這些補貼累加的總額，仍和預期中的蘋果讓利，存在不小落差。

富士康工人取得的，仍是有限的工資補貼。17.94 人民幣的每小時補貼加班費，可說是蘋果公司針對 iPad 生產線的特定工站，「施以小惠」罷了。以 32GB with 3G 的 iPad 為例，按 isupply 在 2011 年 3 月公佈的較新數據，每台 iPad 的物料總成本，比該機構於上一年度公佈的相關數據，提高近 50 美元；可是相關產品的代工組裝製造費，卻逆向下滑 10 美元，而比上一年度減少 1.2 美元(註 25)。這項令人錯愕數據，說明了更微薄代工費的形成；而蘋果針對少數 iPad 生產線工人，提供特惠的加班補貼，則形同公關支出，是它品牌形象重塑的一環。

蘋果因應下一階段品牌競爭的策略，是讓富士康不再成為 iPad3 組裝製造的唯一代工廠(註 26)。這樣發展使得蘋果在上、下游利潤分配的談判角力上，越發佔有壓低代工費用的優勢。它顯示，作為

蘋果代工廠的台資富士康，以及世界工廠最底層勞動力的中國農民工，在極化的資訊科技商品鏈中，如何和創新獨占的上游蘋果，一起綁縛在極度不對等的全球獲利關係網絡中。這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體制在越界生產網絡中勞動價值的不均等分配(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labor value in the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註 27)；它同時在不同生產節點的勞資之間，誘發出層層剝削的循環惡果。它更指向了已故的蘋果傳奇人物賈伯斯，才曾經是全球資本主義年代最擅長越界剝削的「剝削天王」(註 28)！只要作為蘋果下游的富士康，賺取極低比率代工費的現狀不變，有限度調漲了薪資的中國農民工，還是全球生產網絡中最廉價勞動力的同義詞。

三、抵抗亂流

深圳富士康大舉遷移，捲起工人分流的一波波巨浪。本報告因此關切，世界工廠主要勞動力的中國農民工，如何在產業內遷的時代變局下，面臨了資方「迫遷」的都市生活「亂流」。女性勞工源源的「反迫遷」案例，則見證一介底層勞動力，面對資方幾近強制的分流，如何採行了溫和卻頑強的個人抵抗。

我們也在分流，強迫我們去南海[廣東那邊的佛山]，強迫去。我女兒快過來了，我不想過去。我們有家庭都不想去。我們不願意去，天天讓我們放假。有調休假。打電話給我們，說今天沒事幹，給你們放假，我問：幹嘛讓我們...。請事假沒錢，我[只好]請病假。

病假[才]有百分之八十工資。普工有關係的，可以換過去，好搞。

沒有的，不知...。同事調部門，已經找到，就過去了，現剩我自己，還沒找到新部門。他沒給我找到，我現在自己找。

探究源源抗拒分流意識的形成，和她背後那一整個打工仔家族網絡，在迄今三個世代之間，複雜的空間流動以及社會形構有關。

[媽媽]原在新疆，回來[老家]了。[現在]只剩爸爸在新疆。一家四分五裂，都出來掙錢(註 29)。

源源的爸媽早年遠赴新疆幹活，當建築工人，在那邊待了二、三十年。她和哥哥、弟弟，三個孩子全部留守中原老家，由隔壁村落的姥姥帶大。等到她們第二代長成後，同樣出外掙錢，卻不再依循爸媽足跡。源源的弟不肯走向西北偏遠的那條打工路，讓離散多年的父親難掩失望。阿原說：「我老爸要我去那裡[新疆省石子河市]，我不去。晚冷、中午太熱」(註 30)。「況且他如今對『家』的認知，

已轉變為：「我哥、我姐、嫂，一家人都在富士康工作。」

他們的哥現年二十幾歲，在富士康幹了好多年活，是某事業處的組長。源源是在 2009 年進廠。二十出頭的她，有一個才幾個月大的女兒。她的老公是同鄉，在小廠打工，去年小倆口結婚後，夥同哥嫂，在富士康南門外的水斗富豪新村一起租房，兩對夫妻合住兩房一廳的出租屋。城中村租房的這類人際組合，殊異於富士康「宿舍勞動體制」（註 31）下無家庭、社會連繫匱乏的打工仔生活。至於她弟弟阿原，曾在 2006 年進了富士康，打過一年多的工。他後來辭工，漂泊其它沿海省份，最後才輾轉回到深圳。這裡於是成為他們家人的打工根據地。目前他在富士康北大門外清湖村，創業開了家小店，他做的，還是富士康人的生意。

源源的媽媽今年四十四歲。她即將帶著兩個孫兒，前來深圳和離散二十多年的兒女們團聚（註 32）。他們慶幸，源源的哥在富士康的工作部門，還將繼續留在深圳，眼看這個打工家族蔓延了三代人的親子離散，悲情就要終結。但是天不從人願，廠方遷調南海的派令，讓三年前跟隨哥哥腳步，來到深圳富士康的源源，在去留的抉擇間，陷入了兩難。

為了小孩，都已經想到辭職。[卻擔心]另找一份工作，底薪不適合怎麼辦？先生在小廠，工資低，我去那兒，兩個人工資低一起，連存點錢都不可能，都沒經濟條件了。到時，[孩子]要上學，學費高，就一個小孩就夠受了！覺得好累，掙錢有點困難，連底薪都拿不了，有點壓力...

我們聽聞源源自剖，更能理解她如何擔憂這即將延續至家族第三代的離散危機。她表白：「[去年]請完產假，女兒四個月，我就出來了。...[等]小孩過來，[我]沒[別的]地方去了。」源源為了跟孩子在一起，不讓未滿一歲的孩子跟自己二度離散，只有「反迫遷」到底（註 33）。

源源亦見證了富士康勞工二度反抗廠方分流的集體行動。

以前有一部分人造反。他們本來在群創（註：指群創底下的另一個事業處 SA）是一起的。[分流]去[另一個事業處]TP，必須穿無塵衣，[他們覺得]環境封閉，不適合待在那個環境。不願意去，[希望]留下來。[他們就]集體性不幹活，出來。好多人有反映，組長急了，[不得不]說話。當時組長把他們叫到教育訓練室去了。[溝通結果可以]不去 TP，暫時等待，過一、兩天再分流。他們爭取到重新分流，[上級承諾]不會[將他們]分到 TP，[除此以外，他們無論被]分到那裡，就是那裡了。

第一次爭取的結果，成功了！第二天就分流到

觀瀾，別的事業群，不用穿無塵衣[的車間]。[怎料]去了一天，不習慣，[覺得環境]更糟糕，更垃圾。我兩個同事認為不好，不如去 TP，[於是]第二次造反。幾十個一起打 78585 投訴電話。但是他們第二次罷工後，別人不要了...。那是發生在今年(2011)六、七月份，有五十幾個人參加。

富士康內遷分流，導致一些農民工不得不走向辭工一途（註 34）。小尚的事業群也出現分流阻挫後的辭工潮（註 35）。他認識的普工裡面，目前為止也有十多個人辭了工。跟他同一事業群，有來自廣西的普工，一度被派遣到建好廠房的成都富士康，支援了一個月，由於不滿兩地工資落差，又回流深圳。觀瀾廠區的 iDPBG，同樣有被要求分流到鄭州的。工人們考量那兒和深圳的工資差距，竟是連「老家在河南的，好多都不願意回去」（註 36）。

分析富士康內遷的動力，是要解決資本危機的「空間修補」（註 37），這樣的地理擴張，將確保更多土地資本的掠奪，以及持續壓低勞動成本。一旦外流深圳的農民工，由於工人階級意識形成，不甘接受再度下降的薪資水平，就出現「亂流」下緊張的勞資關係。

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資本家創造的神話。富士康內遷，帶動離散在沿海省份的農民工返鄉「回流」，更是過度簡化的社會預設。內遷反倒是不少農民工二度流離危機的起始；它也是富士康工人和廠方管理階層在分流過程中發生衝突的根源。本報告歸納，除去分流目的地和深圳工資所得落差的因素，農民工也可能基於對特定打工地域的主體認同，對於車間勞動環境的好惡評價，以及在深圳形成了移工家庭網絡等社會性因素，展現出抵抗資方分流霸權的勞工階級意識。

富士康底層工人猶如「用後即丟」的廉價勞動力；他(她)們在內遷分流中承受的「迫遷」壓力，是工廠治理者迂迴行使的一種拋棄手段。資方傾向於將農民工假想(而且社會再生產)為孤立個體，在都市生活中，最好全無家庭親子的繫絆。他(她)們被建構為積累驅力掌控的對象，必須隨著類軍事管理者的號令移動。(資方意圖支配打工仔(女)的社會與空間流動)。然而富士康內遷分流導致的工人抵抗和密集辭工潮，雖或曝露出廉價勞動力被資方「用後即丟」的工具性，卻也反證，積累驅力並非富士康打工社群空間流動的唯一支配力量。

四、工人生活物價的全面上漲

深圳富士康調漲工資，以平息連跳事件帶來的形象危機，已屆滿一周年。富士康工人生活消費節點的龍華廠區周圍城中村，包括北大門外清湖村、

南門外水斗富豪新村，以及西門附近的伍屋村和瓦窯排村等，皆出現出租屋租金，以及日用的民生必需品價格，隨著漲薪、全面上揚的物價通膨。「薪漲、物漲」（註 38），除了房租價格抬高，民生物資中則以蔬菜和水果漲幅最大，可謂「民怨之首」。

現在貴的要死。富士康漲工資，一年漲一次，外面物價全跟著漲。菜最貴的。一斤兩元漲到四元。自己煮一餐菜，四十多元到五十多元，還不算煤氣費。2007 年到 2008 年初的那兩年，十多元就可搞定。2009 年到 2010 年漲一次工資，消費漲五毛到六毛；現在漲一元到兩元（註 39）。

高二妹是從廣東鄉下進城的二代女工。她只有初中學歷，卻能夠在進富士康半年後，升作負責一條生產線的線長。「這條線我最小。他們都是八零，我九零。」如今她進廠三年，比線上其它工友們都還年輕，就晉升為管理了四條線（一百多人）的幹練線長。她的打工底薪則從 750 元-800 元（2008 年）、900 元（2009 年）、1200 元-1300 元（2010 年），一路調漲到現在（2011 年）的兩千多人民幣。高二妹記憶猶深，2007 年，她還在小廠打工，天天加班到半夜 2 點（有時凌晨 12 點），一個月猛加班 200 個小時，才拿到 1200 元加班費。她是毫不眷戀，那極度剝削的小廠勞動歲月。她卻感慨萬千，幾年下來「工資漲跟沒漲一樣」，自個兒的生活消費現況，跟 2006-2007 年超時加班的小廠艱苦日子「真的差不多」，甚至當年「物價沒漲，錢還能多存一點」。

「生這麼多姐妹，我就跟他[爸爸]最近、最好。」高二妹嫌新村的樓房租金貴。她寧可和爸爸一起住進清湖老村的矮房出租屋。六年來，他們月租從剛開始一百，漲到了現今的三百塊錢（註 40）。高爸爸靠打水電零工掙錢，一天工資一百，一個月或可賺個兩千多。他的兩個女兒都在富士康工作，合起來總共有四千多月薪。可是他仍感負荷：「賺得一半錢[都]寄回家。老婆和兩個小孩在家裡。讀書很貴。一個初中，一個高中，[只有]讀小學[是]免費的。一個月寄三千五百元回家，小孩要用。存錢要回家蓋房子。要幾十萬。木價上漲了。」

薪資漲、菜價漲，廠內伙食跟著漲，使得廠區周圍城中村內，屬非正式經濟的夜市攤販和小吃店，越發成為工人日常消費的重要替選。比如北大門外，清湖老村鄰近北側門的廠區出入口，除了市場內原有的五十多個攤位（註 41），更有新形成的上百個夜市擺攤（註 42），以及通往老村出租屋區的一整條矮房餐飲街。「這條街麵食館子，這一年都沒漲。餃子一碗六元。沒法漲價，否則[客人]不吃，別的麵食館沒漲，我們就沒漲。」我們從麵食館老闆小角的談話，窺知屬非正式部門的這一類飲食消費（主要服

務富士康工人），是在樣樣喊漲的富士康周邊消費環境中，逆勢維持住它們原來的物價水平。

上班、做生意，賺錢都給房東了。每天特別睏，休息時間少。早上 8 點開店，到晚上 12 點，全年無休。以前中午（註：指下午兩點到五點的午休時段）沒開門，現在，因為房租漲貴了，[富士康分流後]人也少了，所以[不休息]多做一些。這店轉讓費四萬。（註：指這家店租金）三年內從 300 漲到 600 再漲到現在的 1500。上個月做的，都給繳房租，沒賺。

龍華廠周圍城中村的租金調漲，除了住房，更包括做生意的「門面」店租。小角經營的小麵食館店租，就在過去三年內，累計暴漲了五倍。小角的營業，可謂家族動員。每天清晨六點，從老家來這邊幫忙帶孫子的爸、媽，就得起床包餃子、炸粉條；營業至下午四點，他哥哥也會前來交班，跟小角輪流看店。他們又是個富士康打工仔家族。小角的哥哥進過富士康。兄弟倆的老婆，目前也雙雙在廠裡打工。然而急漲的店租和房租，快要把他們這一家子人的生計拖垮了。小角表示：「弟弟和媳婦住[老村]鐵皮房。[我們和爸媽]四個人住[老村]瓦房，內有一大單間，中間用木板又隔了一間，以前三百多，現在漲到四百五十。我們兩個媳婦（註：指小角和他弟弟的老婆）都上班，不[然]光靠店，房租都付不出來。」

我們比較清湖村（含新村及老村）房租和店租的上漲情形，營業店租的漲幅，明顯大過於住房租金的調高。小角舉例，鄰近北側門的老村入口，有一間舊矮房的小髮廊，轉讓費高達八到九萬。他的麵食館對面，一間整修過的小冰品店，光轉讓費就要價六萬五千，外加每月店租 3600（加水電是 4000），至今還轉不出去。小角批評，這些店租都是「隨便喊價，沒啥規矩」。

「門面」租金的飆漲，大幅拉高店家經營成本，且有將之轉嫁到城中村各個消費面向的態勢。以小角麵食館的經營個案來分析，店租漲幅失控，直接衝擊到的，是隸屬非正式經濟範疇的老村小吃店業者。當地幾倍翻高的店租，恐將導致這類型非正式消費部門無以為繼，而預示了區段生活消費逐漸高級化（晉紳化，gentrification）的趨向。待十月中旬本研究團隊成員再訪清湖村時，小角的麵食店終於拉下鐵門，正式結束一年多的營業。

五、富士康勞工住房條件的再改變

5.1 基本介紹

2011 年富士康內遷分流以前，該廠在深圳地區的員工總數一度達 45 萬人，其中估計有 22 萬人入住廠方自建宿舍，23 萬人租住在工廠周圍區域（註

43)。富士康龍華廠區有「紫禁城」的別稱。它作為一座鉅型門禁工廠，採行的是空間自我隔離的圍城策略；包括自建宿舍在內的員工生活區，也一併劃入工廠範圍。這樣的區位配置使得幾十萬工人的隱私生活，徹底圈入廠方支配的地界；工人宿舍儼然隸屬工業工程(簡稱 IE) 管理的社會範疇。

深圳富士康同時是一座被圍之城(註 44)。「圍城」富士康龍華廠區、超標住宅密度的城中村，包括了北大門所在的清湖村；西門一帶的伍屋、瓦窯排、共和村；南大門附近的水斗蟠龍新村、水斗富豪新村、水斗新(老)圍、上(下)油松；以及東邊方位的崗頭新圍仔等。這些城中村也成為富士康工人尋覓外租住房的首選。

至於富士康廠方租用的廠外宿舍，不是分佈在周圍工業區內(包括清湖廠區、硅谷動力工業區和穎博工業區)，就是坐落在「圍城」富士康的城中村生活圈中(註 45)。它們是宿舍勞動體制支配的社會-空間，又納入了城中村非正式經濟所涵蓋的都市消費區位，而成為具中介(in-between)與跨界(cross-border)特性的工人住房類型。

以下根據本團隊的調查發現，逐一分析深圳龍華廠富士康勞工住房條件的再變化。

5.2 富士康員工宿舍

5.2.1 委外的物業管理是否帶來宿舍體制的轉變？

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事件發生後，廠方因應輿論對其勞工住宿狀況的質疑，開始啟動宿舍管理外包的新方案。富士康逐步終結其員工宿舍管理者角色，轉由深圳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中航、開元等)接替第一線宿舍管理的職責(註 46)。我們要問的是，由民間物業公司外包的宿舍管理，果真帶來了富士康宿舍體制的徹底轉變？女工小紅住在富士康北大門外的「百鳴園」。她對於宿舍管理有如下描述：

...有舍監在查房。一、兩天查一次，看床架好不好？安不安全？床壞了否？當然也查衛生。如果被查到三天不回來睡，就別去哪兒了，一律取消住宿資格。宿舍也不能串門子。進出要刷卡，留宿要被開除。

小紅談及的嚴格門禁、舍監查房、不准留宿、不能串門子，以及三天不回，取消入住資格，都是過去富士康禁錮式管理模型的延續。我們分析那是商業考量的物業公司投客戶富士康所好，貫徹他們工人規訓意志的結果。富士康工廠管理機器還是宿舍體制背後最高的影武者。

小紅室友，有分別來自廣東、貴州、雲南和江西等省份的女孩，卻沒有一個老鄉。她每天都是聽著耳機睡覺，否則有的室友房內亂轉，她會睡不著。

由於小紅的好幾個室友都上夜班，不是她們回來，小紅還未醒，就是大夥兒夜白班顛倒，她們在休息，小紅卻獨自兒在玩手機。只有白夜班交接的時候，小紅跟她們才可能碰面，也只有週日休息，大家才有機會聊聊天。不過小紅覺得很不好意思的是，她週日經常會出去玩一整天，玩到晚上才回宿舍(註 47)。

小紅訪談筆記透露，12 人一間的富士康女工宿舍，把來自不同地方、夜白班倒的工友配置一起。這是切斷社會連繫的工人住房制度，居住者成了孤立化的原子。「百鳴園」作為廠外租用宿舍，是個受制於租賃市場價格的商品化工人住房，節省空間，容納最多住宿人數，是在微薄代工費牽制下，富士康營運者承租的關鍵。14 層樓高的百鳴園分成 ABC 棟，小紅住在其中的 C 棟。「宿舍房裡並沒有桌子。她們的床是三層的上下鋪，床上有涼席，小紅習慣趴著，或躺著，在床上邊聽、邊寫地玩手机(註 48)」。富士康工人宿舍仍只是「睡覺」的地方；三層上下鋪的極限性設計，是每平方米計價的租屋條件下，為了迎合承租廠方最大利益的壓迫性空間形構。

5.2.2 富士康廠內生活區出現了層級分化的異化的空間(alienated space)

本文卷頭一開始處，作者引用過一段訪談，富士康勞工說：「工廠做出了甚麼產品，跟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打工的，要有多一點錢就行(註 49)」。這就是勞動的異化。下列我們的訪談所得亦顯示，富士康普工從事知名電子消費品牌的代工製造，是個異化的(alienated)勞動過程；他(她)們工作場所的生產車間，也建構為「異化的空間」(alienated space)。甚至富士康廠內生活區的消費空間，也有部份是以空間隔離的內部治理，形塑出層級分化的異化的空間。

Apple(蘋果)這方面防得很緊。知道嗎？iPad 出貨之前，iPad 生產線的作業員，一個都沒有看到 iPad 的樣子。怎麼樣做到的？大家都知道 Apple 做平板，卻不知道它平板是什麼樣子。因為最重要的是屏幕。(廠方)額外再訂製一個箱子，一個磨砂的箱子，跟 iPad 一樣大。我看過那個盒子，是磨砂的，你看不到那裏面的東西。那箱子會把整個 iPad 的屏幕罩起來，他[她]們不知道 iPad 是什麼樣子。(註 50)

蘋果公司設計的資訊科技創新商品，基於全球市場行銷中與競爭對手的激烈攻防，跟下游代工廠商富士康簽訂了嚴格的保密協議。除了將「蘋果[代工]部門的人，嚴嚴保護」；「蘋果產線管理層的人，很難跟外界接觸」。該公司更是極力防堵對手搶先模仿，避免熱門電子消費產品在製造組裝的過程中，任何創新機密的外洩。富士康離職員工的口述，透

露了 iPad 2 生產者從事勞動生產，卻看不到自身生產出來的客體，而造成生產勞工和生產對象—即生產出來的東西—之間的異化。生產線普工製造的對象，成了與自身無關的身外之物。

像蘋果部門的話，基本上是你早晨進去，一開始手機就放在外面別的地方，鎖住了。然後你下班，才能取回手機。你在廠區內還是要連絡啊，就發一支手機給你。[給]你的手機只能是內部號，跟中國電信搞的，就只能跟內部打電話和傳簡訊。傳不出去。電訊網絡是封的，只能傳內部郵件。電腦的 USB 接口被封住；也沒有磁碟機。那整個系統受監控。你在做事，旁邊隨時可以查得到，你這一秒在做什麼(註 51)？

富士康的蘋果代工部門，生產的是強大連結功能的資訊科技產品，然而他(她)們工作的車間內，卻是與外部資訊體系徹底隔絕的自我禁閉世界，這是異化的生產空間。這種環境異化感更蔓延到涉及管理權力的廠區行政部門(註 52)。

涵蓋生產和再生產空間的富士康龍華廠區，是個層級性空間，它們建構的背後，是勞動力社會分化與空間隔離的治理意識形態。已離職的富士康陸幹小妍，如下詳述曾經令她感覺不舒服的廠區空間經驗：

你進去，你發現會迷路。因為全部長一個樣子。...我一進去，開始我們是從總裁辦公室的鐵皮屋那邊進去。那邊還比較生活，有噴水池什麼的，所以還不錯嘛！然後，我看到總裁辦的正對面，就是一排矮房子，三層樓的矮房子，修的還可以。他們說，郭台銘每次來，都會住那裡，那是賓館。那個賓館也是一定層級的台幹才能住的。我當時聽了，心理就有一點不舒服。

旁邊都是像麥當勞那種吃的[地方]。然後有家咖啡廳。我說，我想進去喝咖啡，那個女生就跟我講說：‘不行，我們進不了這個店。’我說，為什麼？‘因為我們倆層級都不到啊！’[她回答。] 我是師三，都進不了。而且那家咖啡廳好像台幹才可以進，它旁邊就是郭台銘的賓館(註 53)。

...富士康廠區很大，像個小城市。它有刻意去劃分層級，這可能是讓人心理壓抑的原因。它會有一些空間，只有一定[層級的]，比如說師五以上幹部，才能進去。你怎麼知道呢？因為門口有門卡嘛！我們每個人都有廠牌門卡，刷一下，開得了，可以進去，開不了，就進不去。讓人覺得，你幹嘛把人分成那麼多等級？心理上更有壓力(註 54)。

那個鐵皮屋現在都還在，是總裁室，是個平房。最神奇的，不是那個鐵皮屋，是那邊又修了一座廟。應該是風水上需要一座廟。我問，可以進去看嗎？他說，不行，層級不夠，都進不去。我的香港老闆也不行，他才師七吧，不夠啊！要師十，還是師十二才可以(註 55)。

5.3 城中村出租屋

5.3.1 矛盾

富士康內遷啟動的分流，造成深圳龍華廠區現有勞動力的減縮。矛盾的是，富士康勞工外租的住房需求，已經減少，何以歷經了迄今最大租金漲幅的周圍城中村租房，不僅價格未見跌落，甚而有的還在持續攀升中？有小商販樂觀認為：「搬走很多人，還是有人搬進來。房租還漲，說明租的人也多，不一定是富士康的人在住。過一段時間，天虹商場準備要開一家在這兒，今年年底要開。」

雖或鄰近工業區亦有工人外租的穩定住房需求，緊貼富士康南門的水斗富豪新村，還是富士康工人廠外租房的消費集中地。只要富士康員工的廠外住房供給，依附於自由經濟下的租賃市場 不論它屬正式，或者非正式部門，當地租房供應者就會隨著工人消費潛力提高，趁勢調漲租屋價格。接下來富士康內遷分流，深圳龍華廠區工人數量遽減，為何城中村非正式租房未見租金向下修正？房租行情居高不下，是在租屋供需以外，受到其它因素干擾的結果。

5.3.2 深圳城市規劃=製造業農民工終極逐出的治理工具？

那是同一時期，深圳龍華街道另外出現都市發展的重大變數，使得富士康農民工的都市住房消費，受到了衝擊。如前言所分析，強調「深港合作」里程碑的深圳地鐵龍華線，幾個月前開通，追求關內、關外一體化的深圳城市規劃，加速推進。包括富士康龍華廠在內的舊工業化區段，可望在新一波都市化之後，編入更符合「花園城市」意象的「龍華新城」(註 56)。

因此，在深圳產業轉型的進程中，地方政府如何透過具正當性的城市規劃手段，擠壓非正式經濟的發展，間接使得農民工陷入都市生活困境，也就不難理解了。深圳城市規劃的終極任務，是要將底層製造業工人逐出城市。地方治理者從未概括承受幾百萬農民工進城，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基本消費需求。根據潘毅與盧暉臨的研究(註 57)，尚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是認識中國農民工制度的關鍵。在

都市地區生產，在農村地區再生產，則成為中國農民工無產階級化的特色。我們的富士康工人都市生活調查，則在經驗層次上進一步發現，深圳這座城市仍需倚賴非正式部門以及資方私有化的消費供給，局部修補數十萬農民工從事勞動力再生產的偌大缺口。

於是富士康內遷分流之際，龍華廠區周圍亦出現大規模房地產開發的利益驅動。一消一長的都市演化，使得富士康普工為主的外來農民工，不再是城中村房東單一爭取的住房消費者(即便，富士康工人還是他們最重要租客源)。我們的空間調查發現：城中村新一波開發的統建房、集資房和商品房，正在快速搶建，有的也已完工，在住房銷售市場上火紅推出。這意味城中村既有出租屋，不再是本地「原住民」在城市營生的唯一憑藉。涉及土地投機的新興房地產市場，更具短期暴利的投資回收潛力，可謂當年失地農民從「食利階層」的出租屋房東，進一步縉紳為都市新富的重要途徑。(本報告第六章，將詳盡分析龍華廠區周圍非正式經濟的正式化與鄰里高級化，如何導向工人生活圈內更大範圍的階級重組)。

5.3.3 城中村出租屋的合法化趨勢

本章節接續說明，富士康勞工非正式住房的城中村出租屋(註 58)，怎麼樣朝向合法化的社會進程。

富士康最初在龍華創建廠區，是從南往北發展，緊鄰南門的水斗富豪新村，成為這個廠區周邊較早開發的城中村之一，它迄今建成的出租屋，則有近兩百棟。「這裡 92 年開墾。寶安區只能建 480 平方米[註：指宅基地面積]，有錢[註：指走後門、送錢]蓋高；沒錢，就拆了，違建賠償。[富豪新村]最早[蓋]三、四層，[後來改建]到五、六層；二十幾年前，[再搶建，修到更高]到七、八層。現在[最高的，有]十五、十六層高。像大禹治水，堵是堵不住。深圳那麼多人，住哪裡？土地有限。」根據一名二手房東口述，油松是以前龍華鎮這個行政區域中的一個自然村，底下分成上油松、下油松、共和、瓦窯排、伍屋和水斗等各個生產大隊。現今水斗富豪新村則是「生產隊的農地，規劃後，[輾轉]賣給別人，以增加利益。規劃後，首先按原住民的人口、戶口分；再轉手賣[掉]，多餘，賣給別人。現在[一棟]最少兩百萬」。如今，「只有 20 棟是原住民的。其中只有一到兩位[原住民]房東，還住在這裡，[其它]有的住老村，有的在外買房」。

水斗富豪新村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出租屋房東，是當年的「失地農民」。至少有兩、三萬人居住的這座新村，幾乎清一色是租屋暫住的外來農民工，本

地長住人口，早已寥寥無幾。它印證了居住超過十年的農民工所說：「這兒都是租客，根本不認識房東。房東是誰？住哪裡？都不知道。」另一名打工的女租戶則表示：「這裡很多是幫人看守的[二手房東]，一個月，一整年固守，來拿[租金]，[真正房東]沒看到過。」我們發現這些非正式住房的租金收益者，絕大多數轉手為外來投資客，城中村出租屋除了進入自由租賃市場，也實質商品化，成為房地產投資和炒作的一環(註 59)。

屬「違建」農民房的水斗富豪新村出租屋，也有行情活絡的土地及房地產投機。「移民的成長很快，以前幾萬一塊[註：指在一塊宅基地面積上，建成的一棟樓房]；現在兩百萬一塊。」也有外來經商的投資者，談及當地更高行情：「這些房子本來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叫做農民房。以前一百萬可買到。前兩、三年，一百五十萬買得起，地皮三十多萬。現在，最多要四百萬。」

非正式勞工住房租賃市場背後，是房地產投資市場的蓬勃發展；與之呼應的官方政策，則包括傳聞在辦理中的「房本」，作為它們在過渡階段取得認可的憑據。這也說明了城中村非正式住房，即將從「違建」的農民房，朝向正式化認定的官方權宜作法。「有房本。正在辦理房屋證，要打稅。買 70 年，可申請辦『綠本』(註 60)。房屋證分[宅基地面積]480 平米的，以及超過 480 以上[平米的]。(註 61)」

至於富士康龍華廠區的廠房往北邊大幅擴建，不過是七、八年前的事。清湖村作為北大門外勞工消費的空間節點，還保留完整的舊村聚落，也有較高比例的「本地人」房東，和數以幾萬計的外來租客們，同住清湖新村樓房中。然而這並不意味，外來投資者的土地投機和房地產炒作尚未到來。城中村「違建」的合法化趨勢，更暗藏在深圳市府針對清湖片區所擬定的分區城市規劃圖中(註 62)。

5.3.4 等級落差的住房條件

深圳龍華廠區周圍的城中村出租屋，作為都市勞工住房的非正式供給，無論就空間品質、區位分佈，以及環境基礎設施等，皆存在差異性。這些等級落差的住房條件除了對應出自由租賃市場的差異租金行情，更是富士康勞工內部層級分化的空間表現。

富士康周圍城中村的非正式住房，還出現了富士康勞工和更弱勢城鄉移民在租房條件以及區位選擇上的差異。它意味了大量進城的農民工，彼此又形成差別的消費層級，是勞動力社會分化的空間表現。譬如龍華廠區北門外的清湖村，區分為新村與老村；無論是老村內，七百年古聚落遺留的幾百戶矮房，抑或是新村內，不超過七、八年營建歷史的

一、兩百棟樓房，絕大部分成了外來打工仔/女在城市落腳的「出租屋」。然而清湖新、舊村的租戶之間，仍有明顯的社會分化。富士康勞工和底層城鄉移民，是根據謀生職業、住房消費能力、移工歷史的遠近、是否同鄉，以及不同打工世代的差別生活形態，而租住在新、舊村聚落的差異區位。

在富士康上班，就住樓房；年紀大一點的，住老房子。(註 63)

複雜，說不清楚。做[小]生意的、[小廠]打工的、搞舊破爛的，搬來[舊村]這裡。亂七八糟，[富士康工人]看不起的。[這兒]便宜；高的[樓]，貴一點。...沒辦法，我養房子都養不起，肚子還有一個洞，不得飽。住這個小房，馬馬虎虎。(註 64)

老人住在[老村]這邊十一年了，他說有錢的人才不會住在這邊，就是沒錢的人才會住在這種破房子。(註 65)

他說住在老村通常都是做[小]生意的。住一層樓的矮房，是因為做生意有[三輪]車子，就有位子放。像妳們這種[富士康]打工的，就會住在新的樓房，比較貴一點，可是也比較不會有老鼠爬來爬去，好多了。(註 66)

清湖新村與老村出租屋的價位高低區別，形構成富士康員工和老村租戶之間，涇渭分明的居住區位。鮮少富士康員工租住清湖老村。在老村生活的富士康勞工，多是與父母同住的二代底層城鄉移民。老村租戶大半仰賴都市非正式部門提供的工作，維持生計(註 67)。租住新村樓房的富士康員工，雖然在都市正式部門的大廠工作，仍必須憑藉都市非正式經濟，取得吃與住等基本生活消費。總括來看，這些底層城鄉移民是長年為富士康勞工提供都市服務的集體貢獻者。(若非這一群底層城鄉移民作為都市非正式部門的勞動力，提供較便宜消費，富士康資方怎麼可能低薪聘僱大量的農民工，作為工廠底層勞動力?) 當富士康勞工和底層城鄉移民出現空間化的社會分化；兩者在都市日常生活，同時形成了互賴共生的結構性階級關係。

5.3.5 不再是原子化勞工？ 富士康打工仔/女的城中村社會網絡

中國大陸「打工體制」對於農民工的經濟流動、社會流動(social flow)皆造成限制，壓縮了工人社會網絡的發展(註 68)。本研究在龍華廠周圍的城中村生活圈，經過十天參與觀察，卻發現租住城中村的**富士康農民工，較可能脫離原子化勞工的生活模式，那兒確實存在打工仔/女的社會網絡雛型**。他(她)們的同鄉社群，突破了街道上都是陌生人的都市藩籬；來自「五湖四海」的城鄉移民家庭，也在暫住漂泊中，共構出外來者相濡以沫的新鄰里關係。

外來農民工很難在深圳落地生根(註 69)，富士康宿舍提供的工人住房，也將農民工的社會再生產，化約為無家庭的都市生活。然而我們覺察到，富士康龍華廠區周圍的城中村，卻有可能打破單一原子化的打工生活。不只單身的打工仔/女有了「未婚同居」的自由；也有網絡化同鄉社群，作為都市鄰里建構的基礎。有些打工夫妻以親情召喚孩子的祖父母，千里迢迢從老家來到了深圳，在充斥流動人口的城中村，階段性組成跨越了三個世代的城鄉移工家庭。

富士康女工筱昀是在水斗富豪新村居住超過十年的老租戶。她可以體恤，「為了做事，[富士康打工仔的]小孩多留在老家。父母不能出來的，只能狠心把小孩留在家裡。為生計，沒辦法」。同是富士康員工的他們夫妻倆，還是費盡心思，說服公婆從湖南老家跟著遷移，舉家同住兩房兩廳的出租屋。筱昀的大兒子就讀大浪的幼兒園；小女兒則只有六個月大。雙薪工作的他們，若非同住的公婆幫忙照顧小孩，肯定無法將一雙子女帶在身邊。不過筱昀坦承，這種形式的移工家庭存在著怎麼世代協調的難處。她說：「五歲兒子，家婆帶大的。我的婆婆六十多歲，年齡大了，也鬧著要回[老]家。老人家[總是]想落葉歸根。[公婆]來三、四年了，離鄉背井，不容易啊!長者[跟著]漂泊...。」

筱昀夫婦在富豪新村住久了，交遊廣闊，於是在住家的同一棟樓，以月付六百店租，將一樓門面承接下來，再由公婆幫忙，經營起社區型的小麻將館。坐落在出租屋巷弄的這類型非正式娛樂場所(註 70)，是租住同一城中村的老鄉們，閒暇逗留的地方。富士康工人從單一移工家庭，擴大到同鄉網絡的社會連結，就在兼具娛樂功能的巷弄公共生活中形成。

這邊小孩都喜歡跑出來玩。小朋友外面晃，大人一回生、兩回熟，[家長之間]叫一下，[相約]出來，久，就認識，熟了。這裡開發是最早的。老鄉都聚集這兒，方便一起玩麻將。都住這兒，四個人一起湊個桌。我媽帶她[指小女兒]，還有一個老媽媽，通過小孩，一起玩，才知道是老鄉，一個帶一個，就認識了。(註 71)

原本不熟識的城中村租戶，是透過育兒的共同經驗，開始在老鄉，以及不同省份的移工家庭之間，形塑新的鄰里網絡。普工小尚指認：「富豪住的[小孩]，一般是零歲到三、四歲，學齡前的。至少有四、五十個。」顯見水斗富豪新村這一類型城中村，已出現富士康移工家庭的多世代集居。對小尚來說，即使一家三口進城的消費壓力，懲罰似的，讓他喘不過氣來，他還是擁有了完整的家庭生活。他對照

宿舍生活：「宿舍[給人]深沉的感覺。上班、下班，回宿舍，一覺睡到第二天上班。宿舍，[只能]睡大覺，[要不]出來逛逛、坐坐。網吧玩玩、喝小酒、或打打小牌。[這]不是家。」

分隔成兩房一廳的小尚租房，是跟同在富士康打工的兩名老鄉合租。小尚老婆的育女家居，則是在這個狹窄空間的出租樓內，全天候度過。因此寶寶在屋裡，不時會悶，想出門透透氣，美美就得經常抱她下樓(註 72)。美美自述，除了窩在租房內的「時間難磨」，母女下樓後的空間活動，也侷限在「巷道裡逛來逛去」。生活在同一座城中村的筱昀，則有以下類似批評：「[這兒]最初就沒規劃種樹。小孩子沒地方去，[只能巷子裡]走來走去。寸土寸金，搶著要地皮，不肯給公共[的空間]。我們到龍華文化廣場去？太遠了！」(註 73)。

我們觀察水斗富豪新村兩百多棟出租屋的空間形構：村委規劃的巷弄與街道，分成十米、六米和三米的寬度，而較少出現城中村常見的「一線天」或「臥手樓」。即便村子欠缺公園綠地，主要道路以外的棋盤式巷弄，卻為密集租住的富士康移工，提供了街道生活必要的半公共場域。流動農民工的同鄉網絡，則是當地巷弄文化建構的基礎。流動人口出入使用的村子巷弄(特別是六米寬巷子和三米寬棟距)，更成為居民停留與歇腳的替代性庇護角落。再者，除了小攤販運貨的人力三輪車，租戶們鮮少是有車階級，巷內道路便由租戶們巧妙轉化為鄰里交流的公共廣場，或者是同鄉們聚集聊天、款待來客的地方，而有如日本傳統民宅中的「緣側」(註 74)。

外來農民工在城中村巷道中「走來走去」的「瞎逛」(註 75)，實則是在孤立、疏離中，摸索著社會連帶重新接合的可能性。打工家庭的女性眷屬和長者，是其中一類行動者。比如，清湖新村的東村出租屋區塊，就有全職帶小孩的打工仔妻子們，每天下樓來，圍坐在巷弄正中央，形成了共同育兒的公共流動空間。水斗富豪新村也有外來的婆婆，把可移動的塑膠矮凳，懸掛在孫子推車的手把上，而在每日下午固定時段，依循幾個老鄉租房的動線，有目標地穿梭於特定巷弄中。

富豪新村的房東鮮少在村子內和租客們同住。本地的原住民大多轉賣了樓房與地皮使用權，房地產和出租屋市場中真正的房東，主要是一群外來投資客。他們即便在資本積累的世界具支配性，但是在實質空間使用上，卻宛如虛擬的存有。農民工家屬們雖然以都市游擊方式，在形同居家前、後院的富豪新村巷弄中「走來走去」，還是平反了他(她)們在都市邊陲，落入社會疏離狀態的過度推論。我們

舉證美美的城中村生活，連她的日常消費空間，都不是由陌生人主導的異化都市環境(註 76)。

工人租房集中的水斗富豪新村，仍會在它流動頻仍的都市過程，造成富士康打工仔(女)的社會脫落。外來農民工不易建立連結的社群脆弱性，依舊可能導致他(她)們的孤立無援。住在邊緣巷弄，小廠打工的女租客坦言：「這裡村子多陌生人、不認識，不像老家，同村子的人都聊天。這裡不認識的就不講話。」距離她的租房不遠，同一條巷子的另一棟出租樓，就曾有富士康女工跳樓身亡。同巷的另一名租客則指認：「她十八、九歲。是我老鄉。從樓頂跳下來，死了。我不認識她。她老爸老媽都在這邊住。」

六、質變中的深圳富士康城中村-都市非正式經濟的正式化與鄰里高級化

6.1 富士康周圍城中村新的都市住房營建之正式化

深圳關外的龍華街道，出現新一波房地產開發熱，外來投資客爭相進場，在原來工廠用地上，嶄新營建出酒店、寫字樓等商務用途的現代化高層建築。當地也有村集體提供土地資本，積極參與統建房、集資房和商品房的營建，打破了城中村非正式住房供給的刻板印象，是城中村空間營建模式朝向正式化發展的指標。

龍華廠區西門一帶的瓦窯排和伍屋，開始在「違建」農民房的搶建以外，以村集體模式，介入正式化的都市住房營建。它們分別蓋出更高樓層的現代化集合住宅，以此搶進當地銷售房市。比如，瓦窯排村集體「統建」(註 77)的「寶華大廈」，是 22 層樓高的新建物。它的房地產廣告就強調了：項目配套品牌百貨商場，高標準豪華入戶大堂，「愛·自然」主題空中花園，商住兩用，榮享高額租金投資回報」。這項大型建案是由村集體提供土地，主打與「梅州品牌發展商聯合打造」，每平方米售價 5500-5600 人民幣。銷售人員還現場說明，這一批統建房的買家們可望在律師公證下，擁有合法房屋證的「綠本」。

龍華廠北門清湖村更在老村旁邊的村集體土地上，出現了那一帶最大規模的商品房新建案。「花半里」是由清湖村委和深圳市房地產開發公司合作營建，共計推出 2010 戶商品房，每平方米售價一萬至一萬兩千人民幣，提供建房土地的當地村委，則是 30% 房地產的權利人。「花半里」緊鄰清湖老村，售屋人員在樣品屋解說的現場，特別強調老村北面的「文化公園」，將在 2012 年以後竣工，老村亦將全面改造，多年租住舊房子的底層城鄉移民，以及佔據那兒空地的資源回收集散場，可望拆遷移走。售

屋中心牆面，行銷「花半里」建案的大型霓虹閃燈地圖上，也完全抹去富士康龍華廠區的緊鄰，僅呈現貼近華為廠區的經濟地理優勢。

沿龍華廠區西北側，和富士康只隔著一條「護城河」的梅龍大道上，也有屬農民「集資房」的大型建案甫推出。上述和村集體有關的房地產興建，不論是「統建房」、「商品房」或「集資房」，在房屋銷售廣告上，都強調鄰近地鐵四號線目前終點的清湖站，且著眼於「深圳市政府計劃投資 500 億元建設龍華新中心，龍華成為深圳投資密度最高區域，達到 35 億元/平方公里」的誘人利基。

6.2 城中村生活消費的高級化與正式化

富士康鄰近生活圈的品牌購物，過去主要集中在南門油富一帶，理家超市和油富商場等大型商場，都座落於那個區位。「油富這裡品牌多，店是開給富士康(員工消費)的，(這裡)直走，就是富士康工廠。」本團隊參與觀察了美美姊弟在那一帶的休閒購物。我們陪同的那一晚，在富士康觀瀾廠當流水線工人的美美小弟，街頭徘徊，幾度猶疑後，終於又走回頭，下定決心買下了 255 人民幣一雙的特步球鞋。他買到的已經是八折價。那雙鞋原價 319 元人民幣，超過美美一家子每月房租的四分之三。

出租屋密佈的龍華廠區周圍城中村中，伍屋、瓦窯排和水斗富豪新村內，過去完全沒有流行品牌店進駐。然而眾多品牌設櫃的天虹百貨廣場，近期將在靠近富豪新村出入口，大叉路的斜對街上盛大開張。幾年前，萬盛商場在富士康北大門外落成，則帶動周邊流行氛圍，而逐漸出現了時尚品牌的消費。過去一年來，先是富士康漲薪，接著有深圳地鐵龍華線開通到清湖站。開發較晚的清湖村，歷經都市發展的雙重刺激，除了新一波營建，呈現出正式化趨向，還鼓勵了非雜牌的多樣生活流行商品，進駐到店租持續上揚的當地購物圈。這是城中村生活消費高級化(gentrification)的先兆(註 78)。

富士康工人依舊是低薪資勞動者。他(她)們面對品牌消費空間趨近的同時，也面臨漲薪後通膨加速的挑戰，而逆向激化了日常消費對於都市非正式部門的倚賴。以清湖村為例，品牌專賣店進駐萬盛商場的同時，從它的階梯走道，一路伸展至人行道上，甚而蔓延至富士康北二門的兩側，就有上百個夜市攤商新近形成了。我們於是關注，崛起中的消費高級化，以及擴大需求的非正式經濟，在這座城中村內高度反差的共伴。它也預警了快速擴散的社會片斷化，已然來到原本純粹是都市邊陲的這個村落(註 79)。

表面上那是經濟自由化的都市房地產開發，帶動富士康周圍城中村的非正式部門轉化。(它們朝向

正式化發展，連帶誘發區段消費的局部高級化。) 我們深究這個表象背後，是官方以地鐵開通，關內、關外一體化的城市規劃為誘引，意圖逐出過去以優惠條件，招商引資的大、小製造業工廠，以及它們吸引來的龐大底層勞動力。以龍華廠北門一帶的「清湖片區」為例，沿梅龍大道左側，原來劃定為工廠使用的幾塊土地，受到了地鐵清湖站這個新都市節點的驅動，紛紛營建為商務大樓、酒店或高樓層集合住宅。當地原有的工廠用地和舊工業區，陸續成為房地產投機者窺伺的目標，這又是鄰里高級化的另一顯著徵兆。

城市規劃棘手項目的舊城改造，亦將帶動城中村消費的正式化和高級化。比如深圳城市規劃針對清湖老村的改造，程序性地提及了文物與古村落保護的基本價值。至於一、二十年來，這座老村如何實質成為庇護底層城鄉移民的「出租屋」聚落，以及這群都市貢獻者的基本租戶權，卻是隻字未提，彷彿他(她)們是城市中幽靈的存在。當地還在申請批准中的舊村改建計劃，估算要把數千人口的底層移工，集體逐出城市。這些底層移工是都市非正式經濟的主要勞動力，多年以來，為富士康員工提供了較便宜的都市服務。一旦他(她)們被計劃性地逐出了城市，富士康勞工所面臨的社會再生產危機(都市服務不足)，將更加劇。

七、不是市民的城市-將打工仔子女加速排除在外的醫療與教育

富士康當年的投資設廠與營運，帶來資本和勞動力集中，是深圳關外龍華鎮快速都市化的一大引擎。本報告探究富士康工人的都市生活，則有必要回頭關注：今日深圳城市，是否透過醫療和教育等都市服務的公共供給，維繫幾十萬富士康工人的勞動力再生產？

7.1 都市醫療服務：「這邊人多，住院的人多，沒空床！」

醫療設施是都市服務的重要指標。富士康龍華廠區內，除了鄰近北大門的簡易「社康中心」，主要有「富士康醫院」的設置。它是「龍華人民第二醫院」的廠區分院，雖冠上「醫院」的正式名稱，仍是資深員工認知裡，調派幾名醫護人員，分科駐診的一處「衛生站」(註 80)。誠如這名資深工程師證言：「[龍華]廠區工殤蠻多。割斷腿、手砸傷，[富士康]醫院內天天都有。[廠區]不定期發生的意外中，常見的包括衝壓時受傷、電鍍掉入池子，以及運輸撞死人的」，都必須外送就醫(註 81)。

至於租住廠外城中村的富士康工人，如何取得

日常醫療服務？以富豪新村的小尚為例，有一回，他襁褓中的女兒深夜急病。於是他隻身抱女，輾轉前往鄰近廠區的大型公立醫院求治，甚至一度驅車關內，至深圳兒童專門醫院緊急就醫，卻仍落入了連番受挫的窘境。小尚說：

寶寶四個月大的時候，我還差一點給醫生下跪。[我老婆]她去東莞，我給寶寶餵生牛奶，[結果]腸胃炎。接近凌晨的 11、12 點，我先送寶寶到龍華人民[第二]醫院，[竟然]沒床位，醫生差，一大堆檢查費用[就]要一千多。我又把寶寶轉送觀瀾人民醫院，還是沒有床位。當時[情急]沒有時間觀念，不知道車子開了多久，只記得路途很遠，寶寶再轉送到關內的深圳市兒童醫院。從凌晨 1 點多熬到清晨 4 點，只能等檢查，還是沒有床位。當時我們有存錢，有幾萬元，但是醫院沒床位，還是沒有辦法。我們折騰到清晨 5 點多才回來。第二天的白天，有朋友介紹我們去深圳市龍華醫院，才確認寶寶這是急性腸胃炎，沒啥大礙。我後來才知道，深圳市龍華醫院的醫術好、醫德高。我們不懂那些醫院怎麼會這樣？當時在觀瀾人民醫院，我差一點兒給他下跪，求醫生給寶寶床位...

小尚掙錢多年的存款，實質無助於女兒當日顛簸的求診路。他徹夜奔走，還是眼見稚女淪為醫院的「人球」，癥結就在於該地區大醫院內，一床難求的尋常情形。這個普工家庭求醫碰壁的案例，雖只是冰山一角，卻可窺知當地公共醫療機構的病床供給，並無法滿足幾十萬流動人口的富士康勞工，在都市工作與生活的最基本健康照護需求。

小角到深圳開麵食館以前，在家鄉學的是臨床醫療，他因此能夠針對龍華廠區一帶的醫療資源分配，提出個人敏銳的觀察和評比。

我沒有社保，可能難辦吧！我不知在那兒辦。沒有診所，這邊那有診所？！感覺不方便，都要去大醫院看，排上好長隊。最近的是龍華人民醫院。清湖小學旁邊有個社康中心，但真的晚上有事，卻沒人看[病]。我弟的兒子[晚上]發燒，[到那兒]看病，就沒人，必須轉診人民醫院。這邊人多，住院的人多，沒空床。一起開店，我弟、我、父母親、弟的兒子，都沒有社保卡。我們在家鄉住院，當場就報銷了。...這裡得隨時付現金。

小角的妻子和弟妹都是富士康女工，然而同樣進城打工的其餘家族成員，卻是從小到老，全無醫保的最低限度屏障。他們居住與工作所在的清湖新舊村，即使有兩、三萬外來農民工的稠密租住，也僅開設一家婦科私人診所(註 82)。

7.2 農民工在都市生活的最大困境：打工子女教育資源的取得

富士康城中村的受訪家庭不約而同指出，子女教育是他(她)們在深圳生活的最大難題(註 83)。根據我們的調查，有 60 多萬(註 84)流動打工仔(女)工作與生活的龍華街道，只有中心小學、松和小學和清湖小學等 4 所公辦學校。整個地區的民辦小學則有明珠學校等 5 所(註 85)。

住在瓦窯排村的廣西婆婆，是特地從老家出來，幫忙女兒帶小孩。她如下分析：

外來打工者子女要在深圳就學，可謂難關重重：「民辦學校[一個學期]學費要四、五千，好貴，聽那些人說，一年要一、兩萬塊。讀[民辦]小學，方便在哪裡？打工的人去附近學校，拉去(註：娃娃車接送)。那些車來[載]。好多學校都是私人開的。政府辦的，因為學校場地小，如果不是深圳戶口，好難進去。[打工的子弟]都是去私人學校讀書。這裡太貴了。老家是九年義務教育，至初中都不要學費。有些人[的小孩]大了，就帶回老家，乾脆回老家讀。假如[戶口]轉[的進]來，就在這裡讀。[但必須是]獨生子女，才可以搞戶口。」

廣西婆婆的女兒擁有本科畢業的較高學歷。她和夫婿皆在富士康工作，組成了高於普工薪資的師級雙薪家庭。例如，他們夫婦各自得到每月五百元的較高租房補貼，才使得月租八百的兩房一廳租房，不致成為負擔。但是從這位婆婆的自述，他們屬農村戶口的外來暫住者身份，仍使得這個移工家庭被排除在市民享有的公共服務之外。他們的孩子若要在都市長成，只能通過昂貴的民辦教育體系，滿足基本受教權(註 86)。

清湖新舊村的孩童教育資源，除了座落梅龍大道旁的清湖小學，還有緊鄰它的「清湖幼兒園」，以宛如童話城堡的夢幻建築體，醒目聳立著。由於「整個龍華，沒聽過公辦幼兒園」，在 2002 年左右開園的「清湖幼兒園」，可說是富士康周邊學齡前教育的重要地標(註 87)。「清湖幼兒園」招收了三百多名園生，每人月付的學雜費，總計 4600 元人民幣，和它往昔的收費水平相比，雖然較為平民化了(近乎減半)，卻還是富士康漲薪以後，一名普工每月底薪的兩倍。

上述景況並非基層工人子弟受到教育排除的最谷底。深圳地鐵四號線開通至清湖站，帶動鄰近區段的房市投機。搶搭新一波開發熱的清湖村委，考量村集體可用的剩餘土地有限，於是重新規劃，將原村委大樓改建為獲利回收更快、更高的商務辦公大樓；目前開設「清湖幼兒園」的村集體土地，則將挪用為新村委大樓的未來建地。簡言之，當地在房地產開發的暴利誘引下，連學費高不可攀的私辦幼兒園，都將從城中村學區撤離。從房地產經營者

的角度，「清湖幼兒園」結束營運以後，會有大型商品房建案的「花半里」，憑藉地產投資的雄厚財力，公辦民營，就地打造龍華街道的第一家公立幼兒園。它預計招收六個班。在「花半里」商品房推出期間，附設幼兒園是它銷售主打的強項；待它建成以後，超過兩千戶的中產階級購屋者，則將成為這座公立幼兒園日後招攬園生的主要對象。無城市戶口的富士康勞工，也無足夠經濟能力，進入「花半里」商品房的購屋市場，他(她)們在此一案例中面對的，可謂子女受教權和都市住房權利的雙重剝奪。

中國城鄉二元化，是農民工子弟被排除在市民教育福祉之外的肇因。我們從這樣的制度性後果，更能夠理解住在城中村內的富士康移工子女，為何絕大多數是學齡前孩童。比如容納數萬流動人口的富豪新村，連一家幼兒園都沒有。富士康員工筱昀只能把大兒子送到大浪的育英幼兒園就讀，一學期4000多人民幣的學費，也讓她備感壓力。筱昀直嚷著：「[深圳]這裡競爭太大，活的好累，但是現在工作都在這邊，都沒辦法」。何況筱昀還有個不滿一歲的小女兒。她考慮「深圳消費太高，[將來]兩個小孩讀書、上小學，一個學年要兩萬學費」，即使夫妻倆在富士康工作都超過了十年，仍不得不放棄深圳扎根的念頭。

「我和老公都是農村戶口。我們在長沙市買了房。去年買的，還未裝修。我們目前還沒考慮回長沙。」筱昀夫妻預見，假如兩個孩子長大以後，繼續留在深圳生活，光學費支出，就將壓垮了他們的家庭經濟。於是他們未雨綢繆，轉而在老公老家的湖南長沙，以每平米4500人民幣市價，訂購了一套三房兩廳的電梯公寓(面積114平方米)。我們分析這個富士康雙薪家庭的財務狀況，目前員三的筱昀，月薪2300；師三級的老公，月薪則有6000多。他們除去水電房租(共1900-2000)，兒子的幼兒園學費(每學期4000)，自從在長沙買房，還必須另外負擔每月3000元房貸，而使得筱昀自嘲是個「房奴」了(註88)。

八、理論對話(註89)-都市集體消費和都市公共空間私有化

本文是一篇分析性的調查報告，在經驗地瞭解了深圳富士康工人都市狀況之後，有必要進一步提出理論上的對話。首先，我們歷史地探究都市消費問題，關注富士康工人取得的都市服務，能否滿足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當富士康急遽擴張，帶來深圳龍華一帶勞動力集中的都市生產地景；富士康工人在廠內生活區以及周圍城中村的日常消費，也成為龐大勞動力從事社會再生產的關鍵場域。

由工業資本治理的廠內生活區，以及屬非正式部門的周圍城中村，如何以私有化方式，提供工人生活所需的都市服務？它對於一座沒有市民的城市，又將造成什麼衝擊？我們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觸及都市服務設施私有化的歷史與理論。

都市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 (註90)的討論，源自現代工業化帶來工廠勞動力的高度集中，連帶導致都市空間的消費相對集中，以及勞工運動對生活必須都市服務的爭取。而當工廠營運必要的勞動力再生產，需求不斷增長，而和私人資本對生產利潤的追逐，產生日益尖銳矛盾，就形成了生產領域與(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消費領域之間的斷裂。於是它使得關鍵性消費設施的供給，歷史地仰賴國家干預，此類消費的集體化，也致使都市問題成為政治問題。

生產與消費矛盾的擴大，具體表現在工人住宅、醫療、教育等社會設施的短缺上，勞工爭取生活必須都市服務的過程中，國家歷史地介入，造成勞資關係妥協，從而避免經濟、政治、以及都市的危機。國家政策公共干預的目的，是為了緩和階級衝突，讓資本主義得以順利運作，這也是歐戰後福利國家正當性的歷史建構。技術官僚管理主義的政策角色，以及都市規劃的功能性運作，除了回應工人階級爭取都市服務的壓力，也是為了促進資本主義城市的平順運轉，同時以支配性價值，確保權力集團階級利益的實現。這樣的規劃過程也是協商折衝的政治過程。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將都市集體消費問題，連繫上空間危機與草根動員的都市社會運動，且強調不同階級間市民的團結抵抗，涉及了市民的文化認同和城市的歷史建構(註91)。

然而，都市集體消費作為國家政策干預的都市服務提供，卻因資本的利潤率下降，通貨膨脹顯現，壟斷資本終於宣告經濟危機，福利國家模型隨之被放棄。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1970年代初保守派的在政治上先建立對社會的領導權，翻轉了勞資間的權力關係，經由(1).宣告危機，(2).解除公部門之正當性，(3).親企業，(4).掌握技術革命等過程，在經濟蕭條的形勢下，國家支出由公共與社會部門轉移至親軍事與親企業部門，資本借用高科技的成果，推動了技術經濟的再結構，這也就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新模型浮現。

全球經濟競爭下的城市治理角色，成為此一階段最大挑戰，這即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指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企業主義的抬頭。它造成都市計劃歷史地脫離了戰後福利國家模型所伴隨的管理主義，也擺脫了都市集體消費必須承擔勞動力再生產功能的「公共」包袱。所以，規劃，

如今成為地方發展的制度性工具，它又是引領資本，激勵積累的機制設計。城市，也由公共城市(public city)成就為所謂的私營城市(privatopolis)。新自由主義成為支配性意識形態的政治價值下，都市公共空間被私有化，弱勢的邊陲社群只能自求多福，都市非正式經濟部門無所不在，而成就了都市空間斷裂的雙元社會(註 92)。

今日富士康個案下的勞資剝削關係，益形複雜地受到了全球跨界生產網絡的牽引。本團隊在深圳富士康工人薪資倍增一年之際，重回農民工的都市生活現場。我們歸結，即使全球商品鏈最上游的蘋果公司跨過富士康資方，直接補貼下游世界工廠的底層流水線工人，仍無法掩飾它「跨界剝削」的跨國品牌本質。貌似緩和的富士康勞資剝削關係，並未真正對症下藥，這幾十萬勞工作為深圳農民工處境的重要指標，爭取到的，其實是一帖不具療效的社會與經濟安慰劑。富士康漲薪後的農民工收入，連在非正式經濟下求取日常生活消費，都顯得很吃緊，勞動力再生產所需都市服務不足，不言自明。

結論：工人抵抗意識的抬頭以及社會排除加深的都市狀況

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國家政策的大方向，目標上產生了巨大變化。為了推動經濟發展，國家的政策的歷史改變，連繫上全球經濟。中國自此納入全球資本的經濟網絡。也因為這樣的政治決定，國家技術官僚被強化，都市的新中產階級浮現，年輕的專業者也成為新的社會群體，這在過去的國家政策中是未曾得見的歷史條件。

所以，一方面國家推動一系列的農業改革，包括鄧小平的「三自一包」政策，除了讓農民們的生產意願大增，也有生產機械化的實施，使得鄉村農民也可以提高其農業生產，改善生活，而開始出現了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接著通過勞動市場磁吸的力量，將農民推向了城市。只不過中國大陸農民和英國圈地運動不同。大陸農民在農村仍有土地，稱為「農民工」，而全然不同於歐美的城鄉移民經驗。

進城農民工成為世界市場的製造業勞工，像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就在這樣政策的助長下，成為中國的支配性城市。換句話說，中國農民工進城以及支配性城市的崛起，皆和國家治理者的制度性操作有關。那是中國政府選擇了社會經濟模型，有意識地轉變為「發展型國家」，並且在廣大技術官僚支援下，地方政府也成為「發展型地方國家(developing local state)」。於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全力支持私人企業入駐，協助取得開發的土地，甚至還協助企業招工，比如說「三通一平」政策，即是在

這樣的背景下形成。這些既是地方政府所提出的出色政策，相對地，中央也用它們來衡量地方政府的表現，而構成了兩個層級皆能貫通的治理思維。

在這個國家政策以及地方治理的脈絡下，富士康才得以在全球生產網絡中，急遽擴張，連帶地在勞工生產與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方面，造成管理上的重大壓力。這也造成類軍事管理的有名「郭體制」，進而使得富士康工廠，成為異化的空間(alienated space)。它們是非人性的空間，效率掛帥的空間。這也造成了勞工的異化感。勞工的生產對象，亦即他(她)們在勞動過程中生產出來的東西，本是「客體(object)」。但是，iPad 初始生產時，卻出現了從事組裝生產的富士康勞工，在密集勞動的生產過程中，完全看不到此一「客體」的不可思議景象。工人們生產得到，卻是看不到，那是生產主體和客體的斷裂，是資訊科技代工極深沉的一種異化經驗。

富士康體制帶來的勞動異化，亦表現在它們的生產空間形構上。不人性的空間管理，導致了與工人自身全然無關的異化空間。深圳龍華廠內的生活區，即使是提供勞動力再生產的消費空間，卻是個層級化空間。它即便擁有高品質的商業場所，仍由於帶來社會片斷化的空間隔離，而在社會心理層次上，造成了負面效應，無法讓普工或者陸幹，共同建立起對於這個大企業的歸屬感。在此條件下，富士康勞工自是不可能成為公司的資產。

再生產空間的富士康工廠宿舍，也都是異化的空間。唯有到工廠外頭租房，在那兒的非正式空間從事休閒與消費活動，才可能補償生產空間的異化。我們的調查研究歸納，城中村內的公共基礎設施雖或較為匱乏，還是在特殊時空下，一定程度發揮了都市服務的作用。它們還不算富士康勞工去異化的空間(de-alienated space)。當富士康展開全球連結，它們依然是公共基礎設施繞道而行的社會脫落點。但是我們無可否認，這些富士康周圍的城中村仍為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產生了舒解壓力的效能。

富士康周圍城中村的非正式空間，呼應了無異化的空間，卻也突顯深圳這座城市，還不是一個市民城市，進城的農民工一直沒有被地方國家當作市民，因此並不提供他(她)們住宅以及醫療、教育和休閒娛樂等都市服務。沒有能力進入住宅商品市場的富士康勞工，若要脫離工廠宿舍體制下的異化的空間，則唯有轉向城中村非正式部門，從那兒的廉價出租屋，解決他(她)們大量的住房需求。

然而深圳城市規劃早歷經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洗禮；它的企業型治理也將原屬公益的規劃，轉作引領資本，激勵積累的合法工具。深圳以城市規劃帶動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所及，富士康周圍城中

村的非正式部門開始受到擠壓。現有非正式租房邁向合法化的同時，新的城中村營建也轉向了大規模開發的統建房、集資房和商品房等正式化都市住宅。再者，都市非正式部門在城市規劃刺激下的正式化，則誘發了周邊生活消費的相對高級化，好容易逼使資方漲薪的富士康勞工，依然得在都市貧窮線上，日復一日地載浮載沉。

深圳城市規劃來到關外龍華，土地投機與房市投資的影響層面，竟包括了教育資源的再分配。龍華廠北門外超大型商品房建案「花半里」，將以城市新中產階級的大規模入住，威脅清湖老村數千底層城鄉移民的「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

這項營建亦涉及當地幼兒教育資源的不均分配，它清楚呈現的是，漲薪後的富士康勞工，卻處於社會排除加深的都市狀況。

過去汲汲招引製造業的深圳，如今治理終極目標，卻是要以公共政策的正當性，間接逐出不是市民的外來農民工。深圳富士康大規模的內遷分流，迫使「用後即丟」的廉價勞動力，成了急遽「蒸發」的無印勞工。這顯示，農民工必定跟著西遷的富士康，回流內陸省份，既是過度簡化的預設，也是深圳地方政府加速排除農民工的最新託辭。本研究至此揭露，富士康勞工集體「造反」，抵抗資方分流霸權的底層證言；這也是來自深圳現場，中國工人抵抗意識抬頭（註 93）的又一例證。

註釋

註1 受訪者小尚是富士康龍華廠的一名生產線民工，雖然參與了蘋果 iPad2 的生產，然而對勞動產品的深刻異化感令人動容，值得深思；訪談者趙慧琳。

註2 對基層工人的稱謂。富士康人事等級是從普工→儲備幹部→全技工→線長→組長→課長→專理→副理→經理→協理→副總經理→總經理。

註3 富士康廠方調漲普工薪資，和該廠員工連續跳樓事件的風暴弭平，息息相關。2010年5月期間，富士康深圳廠員工接連墜樓慘死。連中共當局重要風向球的北京中央電視，都大幅報導這些「連續跳」的勞工自殺事件。富士康在全中國佈局超過 90 萬員工的勞動狀況，一下子成為議論焦點，這家台資企業的管理危機，陡然升高。如此情勢更逼得鴻海總裁郭台銘出面，首度回應各方質疑，聲稱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蘋果(Apple)、惠普(HP)和摩托羅拉(Motorola)等富士康主要品牌客戶，亦表達了關切。5月

底，中國中央部委 聯合調查組於是在進駐富士康的深圳廠區，展開勞工墜樓的官方調查。到6月初，富士康在一週內兩度宣佈調漲薪資，預告了10月份開始，深圳廠區普工的每月基本薪資，將調高至2000元人民幣。這個拯救企業形象的動作，在全球電子代工的同行間引發震撼，造成各個資方不小壓力。美國蘋果公司總裁 Steve Jobs 首次公開力挺下游的富士康。港台學界此際展開反制行動。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簡稱 SACOM)，仍將6月8日訂作「全球悼念富士康自殺工人日」，是出自工運立場的基進反制。接著在當月13日，有超過150名台灣學者以「終結血汗工廠，捍衛勞動人權」為標題，發表對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連署聲明。中國世界工廠的外資企業，也在這段期間陸續爆發基層工人自主串連的罷工事件。7月初，天津日資企業「三美電機廠」則有罷工者坦率表明，他們要求加薪，確實從富士康工人的大幅漲薪獲得了啟示。同年10月，郭台銘更搶先在「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發表前夕，宣告正式啟動他所承諾的二次調薪。然而這項薪資調整措施還未屆滿一個月，又見深圳富士康員工新一起跳樓的案發...

註4 1986年設置的「龍華鎮」，遲至1993年初才編入寶安區；到了2004年，龍華鎮改稱「龍華街道」；2006年，龍華街道再拆出民治、龍華、大浪三個街道。我們團隊調查期間(2011年夏)，富士康龍華廠區仍屬「龍華街道」的一部分。但是隔年(2012)，「龍華街道」又脫離寶安區管轄，升格為獨立的「龍華新區」，而為「龍華新城」這一城市規劃願景預作了準備。

註5 回顧1970年代初，資訊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即有後工業主義(postindustrialism)的先驅性理論，宣告工業社會的既有結構已然被取代。到了1990年代，新都市社會學理論家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進一步將後工業年代的探討，轉移到資訊社會(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的初始理論化。他指出這種新的社會結構，源自微電子資訊科技帶來的強力資訊網絡；它所形成的新經濟，更在全球金融市場支配的高度複雜模式下，以高速資訊處理的電子網絡操作，進行鉅量金流的匯兌交易。新崛起的全球資訊經濟和過去工業經濟的主要區別，在於資訊科技新技術範型的移轉。按柯司特觀點，從工業主義轉向資訊主義，並不同於從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的歷史轉換，也不能簡化為服

務經濟單一的崛起。換句話說，資訊社會的產業結構不再依循從第一部門演化為第二部門，再進展到第三部門的線性歷史排序。資訊科技帶來以資訊和知識為基礎的資訊農業、資訊製造業和資訊服務業等活動，在工作過程中並存的體現。不論是歐美已開發國家，或者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無一倖免於資訊社會所統領全球結構的影響。本研究認為，透過全球資訊社會的新興結構，方能窺見消費電子製造業大廠的深圳富士康，和來自美國西岸資訊科技重鎮的 Apple 等科技品牌，如何因著代工製造的上、下游關係，共同納入全球越界生產網絡，且連帶受到新技術範型移轉的衝擊。本註腳中的柯司特理論參考：1.Castells,Manuel (2nd edition 2010).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est Sussex, UK:Wiley-Blackwell.pp.99-100;pp.164-165;pp.217-222. 2. Castells,Manuel(1999).“Flow,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in Cr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Information Age (by Manuel Castells, Ramón Flecha, Paulo Freire, Henry A. Giroux, Donaldo Macedo, and Paul Willi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pp. 37-62.

註6 潘毅(2011),「資本擴張在中國的到來——富士康生產及對工人影響的案例研究」,勞資關係與社會和諧學術研討會論文,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與學術研究主辦,安徽黃山,2011年11月5日。

註7 我們團隊調查期間本團隊展開深圳龍華廠區工人調查以迄的半年內,富士康勞工生產領域又出現轉折。2012年2月18日,富士康科技集團宣佈溯自2月1日起,全面調漲中國各個廠區的基層員工薪資。普工加班前的基本工資可望提高16%到25%的不等幅度,以達到每個月約400美元(約2517元人民幣)的待遇水平。這是2010年以來,富士康第三度調漲薪資。然而不同於前兩次調薪,是肇始在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所導致輿論壓力,這回帶動普工生產條件再轉化的根本驅力,卻是美國主流媒體,它們作用的關鍵,則為了監督全球商品鏈最上游的蘋果公司。那是美國境內公共輿論接連點火的砲轟下,時尚蘋果的品牌受到重創,而面臨著自身公關形象的災難。如此,為了修補品牌形象,降低它對商品消費端產生衝擊的負面效應,才默許工運越界的施壓。此一推力回過頭來,開始鬆動下游富士康等代工大廠的管理

禁地,始能前所未有地,重新檢視這個生產體制對於世界工廠勞動人權的普遍壓抑。且當爭議後續延燒至西方主流媒體,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廠」(sweatshop)?仍是這一場公共論戰的核心。

註8 此段落說明引用自 Harvey, David (2012). *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p.35) London : Verso.

註9 此段落說明引用自 Harvey, David.(2012). *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p.129) London,UK: Verso. 作者哈維還分析,和大眾日常生活品質密不可分,包括剝奪、地租占用等積累手段,以及透過貨幣與利率的漫天勒索,於是成為了都市異議者共同關切的面向。

註10 此觀點採用了批判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都市化論述。他強調的是資本積累的都市過程。此相關論點可參考本計畫書理論文獻回顧的辯論二:都市化是個政治過程?抑或是資本積累的過程?

註11 富士康在中國的持續產業擴張與區域分散佈局,被稱作「富士康造城運動」;在中國總雇工8、90萬的郭台銘本人,則被暱稱作「中國富士康市市長」,是龍華小鎮從「荒蕪」中快速都市化的推動力。此概念參考下列的一段引文:「1988年10月,郭台銘在深圳西鄉山腳下開辦了只有百來人的工廠—富士康海洋精密電腦插件廠。而到如今,走進戒備森嚴的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大門,就像置身於一座設施完善的城市。在這座「城市」裡,每天都有數十萬人在不同的時段裡活動...如此龐大的人員吃喝住行,對龍華周邊消費的拉升,構成了直接的推動力。富士康就像一座巨大的磁石,吸納著越來越多的供應商、各種配套產業,也同時帶動了龍華的城市化進程。當時還屬於一片荒蕪之地的龍華小鎮,由此在20年後,一躍成為深圳的一個行政區域—龍華區。」(摘錄自〈危機背景下的新造城運動 富士康的江城攻略〉,華夏經緯網文。)

註12 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受訪者源源是富士康龍華廠的一名周邊工作人員。

註13 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受訪者源源是富士康龍華廠的一名周邊工作人員。

註14 富士康旗下設有十餘個事業群,不同事業群在生產產品和技術上各有分工與側重,但它們之間仍存在激烈競爭,會在年中,根據業績進行排名。富士康的各個事業群下面則有不同事業

處的設置。

註15 來自內陸省份的小尚進一次進廠，在富士康總部周邊的物流部門工作了兩年多，每月薪資所得兩千多。此期間，他和同在富士康工作的外來打工女美美，深圳酒吧裡一見鍾情。他們交往後，為了解決老家相 離好幾千哩的阻隔，才索性一起辭工，回家鄉結婚。

註16 2010年9月「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的內容，多處形容富士康勞工的原子化狀態。比如，「系列三：生活空間—囚在富士康帝國」提及富士康車間和宿舍內碎片化的社會關係，造成工人們處於一種原子化狀態，是原子化的個人。(參考該報告書第41頁。)

註17 美國公平勞動委員會(FLA)以及香港工運組織SACOM於2012年3月份，相繼發佈有關富士康勞動人權的稽查報告，指出代工製造的旺季，部分富士康(尤其是全球熱銷 Apple 產品的)生產線上超時加班的情形仍舊存在。

註18 小紅說，那家東莞小廠是她進的第一個廠，做相機，底薪1300多塊人民幣。她形容當時工作情景：「那兒加了班，累死累活，才賺這些。那邊的廠，是黑廠，星期天不讓妳休。上完工，錢花不出去。受不了熬夜，幹完活，凌晨三、四點，才休兩、三個小時，七點起床，八點上班，又第二天。[工廠]不讓[妳]旅遊，就算了，他不讓[妳]買有關東西，打手機也沒時間。」

註19 小尚和老婆美美的訪談口述皆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20 小紅的訪談口述皆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21 我們訪談期間，小尚工作的事業群正在進行內遷前清貨，因此一般作業員的加班機會更少。

註22 富士康普工加班費計算方式：加班費\H=標準薪資除以21.75天除以8小時；平時加班費=加班費\H乘以1.2；週六周日加班=加班費\H乘以*2；法定加班=加班費乘以3。

註23 新京報引述消息人士說，蘋果公司準備對其在富士康代工的產品進行直接補貼，用於提高相關生產線工人工資。蘋果公司調查小組在調查後認為，富士康員工工資低是導致跳樓的主要誘因。為幫助其最大的合作代工廠商早日走出輿論困境恢復正常生產，蘋果公司擬對本公司在富士康代工的相關產品進行直接補貼，用於提高工人工資待遇。報導說第一個受補貼的產品將是 iPad，補貼額為蘋果 iPad 產品利潤的1%至2%，相關事項已提交蘋果公司董事會。目前蘋果公司支付給富士康的 iPad 代工費大

約占總售價的2.3%，補貼後預計能達到3%，相當於 iPad 外殼鋁框架的成本。不過本報告比對 isupply 公佈數據，以 16GB with 3G 的 iPad 為例，每台組裝費 11.2 美元，僅佔它零售價(629美元)的1.78%。

註24 富士康普工加班費計算方式：加班費\H=標準薪資除以21.75天除以8小時；平時加班費=加班費\H乘以1.2；周六周日加班=加班費\H乘以*2；法定加班=加班費乘以3。以此標準推算 IDSBG 事業群從事 iPad 主機板生產的一千名普工，一整年的加班補貼費為：2000人民幣除以21.75(每個月平均天數)除以8(小時)=11.5人民幣x1.2小時=13.8人民幣(平日每小時加班費)x1.3=17.94人民幣(每小時補貼加班費)x2小時(每天最多加班時數)x21.75(每個月平均天數)x1000(總人數)x12(一年的月份數)=9364,680人民幣。兩千名工人則是9364,680人民幣x2=18729,360人民幣。若以6.4人民幣兌換1美元的匯率計算，一千名富士康 iPad 代工工人整年度補貼加班費共計1463,231美元；兩千名富士康 iPad 代工工人則是2926,463美元。

註25 2011年3月公佈的相關資訊，可參考 iSuppli 網站：

http://www.isuppli.com/PublishingImages/Press%20Releases/2011-03-12_iPad2_BOM.png

iSuppli 於2010年2月公佈的 iPad 32GB with 3G 相關資訊，Total Materials Cost \$ 275.95；Total Manufacturing Cost \$11.2，亦參考 iSuppli 相關網頁。

註26 蘋果欲打破由富士康獨家代工模式，準備增加第二家 iPad 製造商，和碩與廣達是有力的競爭者。參考2011-07-15華夏經緯網「獨家代工模式或被顛覆？‘失寵’的富士康怎麼辦」一文。

註27 參考夏鑄九(2011)，「再論設計與社會變遷」(An Elaboration of Design and Social Change)，p.11，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主辦，「城市發展與空間變易」研討會，2011年11月26日。

註28 參考夏鑄九(2011)，「再論設計與社會變遷」(An Elaboration of Design and Social Change)，p.10，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主辦，「城市發展與空間變易」研討會，2011年11月26日。

註29 這段話是源源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30 這段話是阿原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31 2010年9月發表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

研總報告，要求富士康廢除車間化管理的「宿舍勞動體制」。(參考該報告書 p.45) 該調研活動發起學者潘毅的研究即將工廠大量使用外來工，並利用工廠宿舍暫時性安置外來勞動力、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概念化為「宿舍勞動體制」。她認為，其作為一種另類的社會空間形態，是隨著全球化生產的去地域化而在現代中國出現。這既是一種勞動管理方式的新類型，同時也是勞動團結與抗爭以及勞動關係出現新類型的平台。「宿舍勞動體制」應該被視為生產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工廠中，無論是資本還是工人，都在通過控制這個空間來增加各自的權力。勞動控制與抗爭的辯證關係在宿舍空間中被充分展示出來。上述詮釋引自任焰、潘毅，2006，「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會學研究》，4：21-33。

註32 源源的哥有個三、四歲大的女兒，是爺爺、奶奶帶在身邊的留守兒童。她出生後，跟著外地打工的爺爺、奶奶跑新疆，不真的留守老家。直到去年，源源的孩子出生，這女孩才跟著奶奶回老家，由奶奶獨自一人擔負起兩個孫子看顧的責任。

註33 2011年10月初本團隊成員再訪深圳，源源還未找到可以調換的部門，所以繼續請假超過兩個星期。她並未放棄希望，也利用這段請假的空暇，回老家探視女兒。

註34 有的被迫分流，但是不願意去；有的不得不分流，出去了，卻無法適應，最終還是辭工。源源在同一事業群所認識的富士康員工中，有十多個人辭工。她舉例同是周邊(IDOS)人員的兩名全技員，覺得做產線不適合她們，不幹了，兩個月前辭工回家。她解釋：「她們是分到別的部門，也不想幹了，適應不了，攝像頭很多。[感覺]什麼都被監控，連個自由都沒有。兩人做事，說一句話，被發現，要被說，就離開走了。被管束，被屌，不舒服。不能講話，線長話多。那兒燒錄室根本是變相垃圾房，本來人就不是很。辭工後到別的地方，去找老公或男友。分流後有陌生感，要經一段時間熟悉，連同事一塊兒吃飯的地方都沒有，感覺憋扭，就辭工了。」以上源源證詞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35 小尚工作的 iDSBG 事業群主要生產蘋果平板電腦(iPad)，之前已經分流一萬多人，併入同在深圳的觀瀾廠區 IDPBG 事業群，兩個月後，他們也將移到四川成都或者河南鄭州。比如他

那條生產線上的一名物料員，去年跟富士康廠方簽訂工作合同，要分流到成都，卻由於他的家鄉廣西和成都相隔兩千哩，仍決定不去。他馬上就要辭工。

註36 此一普工說法，引自趙慧琳的田野筆記。黃舒楣的田野筆記也有如下記述：「工資方面，他們已經通過考核獲得 2390 工資(底薪)。我問起他們是否考慮內遷鄭州廠，離家鄉比較近？小楊表示不願意內遷到河南鄭州廠，因為派過去之後只能維持深圳底薪兩個月，隨後即以鄭州水平計算(底薪一千兩百元)，差距可達一千元，他還是寧願在這邊待著，存錢快一些。他們幾位對未來都沒有很肯定確實的計畫，似乎還在觀看時機和廠內政策、內遷的變化。」

註37 引用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出的資本「空間修補(the spatial fix)」概念，意指資本主義面臨過度積累危機時，為了避免貶值，將過度剩餘的資本或是勞動力外移到其它地方，所進行的地理擴張。參考自 Harvey, David (2001)“The spatial fix: Hegel, Von Thunen and Marx”, in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 a Critical Geography* (pp.284-311). New York: Routledge.(First published in 1981). 1 高二妹訪談的口述，皆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38 高二妹訪談的口述，皆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39 高二妹訪談的口述，皆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40 他們父女倆的夥同租屋，水電另計(一個月一百元左右)。同在富士康打工的高家三妹，則和同事合租清湖新村的樓房單間，不含水電的月租四百多元。

註41 當地小販有此說法：原來由村委收取租金的這塊市場用地，拆除後將蓋 18 層樓高的住商混合寫字樓，已經設計好，上面樓層可能作為富士康員工宿舍。我們因而窺知，不論市場改建還是舊村改造，都是將富士康勞工仰賴的非正式經濟驅逐的開發政策。

註42 根據本團隊成員於 2011 年 10 月初的現地調查，富士康龍華廠北二門人行道上的近百個夜市攤位，進場費(一萬元) 加上轉手費的總價碼，已經喊到兩萬，好的位子還喊到兩萬五千。它們每個月的租金則從原來六百，漲到八百，再漲到一千五百(好的位置喊價到兩千)。我們訪談到的攤販抱怨，租攤子的索費太高，即使搶到位子，擺攤做生意，每個月肯定賺不了那麼多錢，於是決定不進場了。

註43 富士康員工宿舍則包括深圳龍華及觀瀾兩大廠區自建的 33 棟宿舍樓，以及廠外租用的 120 棟宿舍。這是 2010 年 6 月 25 日，富士康科技集團和深圳中航、開元物業管理公司簽訂員工宿舍外包管理協議時，廠方向媒體公開說明的數據。深圳富士康的勞工住房需求，一半訴諸資方「包吃包住」的宿舍勞動體制；另一半則交付自由租賃市場，讓工人自行在外租屋來解決，且其中絕大部份供給仰賴廠區周圍非正式部門的城中村。根據 2010 年「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參考表二)，自行在外租屋的 45.6% 富士康員工中，除了 8% 入住城市商品房，其餘絕大部份皆選擇私人或村鎮集體的出租屋，至於地方政府公共介入的廉租房供給，卻幾近於零。我們比對城中村「圍城」的龍華廠周遭區位環境，加上實地觀察，推斷租住廠區周圍的 23 萬富士康員工，大部份住進了城中村的出租屋。

出租房 類型	私人出 租屋	村鎮集體 出租屋	城市商 品房	當地政府 建廉租房	其 他
百分比	70.4	19.7	8.0	0.3	1.6

(此列表引自「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總報告的附表：富士康外住工人租房情況。)

註44 從富士康龍華廠的區位環境分析，資本都市化的空間再形構，在原來的關外城鄉接合部，具體表現為都市地景蔓延，反而將原來農村聚落包圍成一個個的「城中村」孤島。不過在它發展的過渡階段，城中村卻也逆向「圍城」，形成了圈陷富士康產業地景的新都市意象。

註45 此富士康廠外宿舍調查資料引用自余映爛和董彥希的田野筆記。

註46 2010 年 6 月 25 日，富士康集團副總裁程天縱在變革發佈記者會上，坦承過去宿舍「是全天候‘校園式’管理，雖然提供給大部分員工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但無形中也減少了員工融入社區的機會，同時也不能滿足目前‘80 後’、‘90 後’新生代產業工人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富士康廠方並計劃由住宿員工代表，籌組相關的權益委員會，富士康工會聯合會同時負責監督。

註47 水斗富豪新村老租戶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48 富士康女工小紅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49 受訪者小肖是富士康龍華廠的一名生產線男工，雖然參與了蘋果 iPad2 的生產，然而對勞動產品的深刻異化感令人動容，值得深思；訪

談者趙慧琳。

註50 富士康已離職陸幹小妍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的田野筆記。

註51 富士康已離職陸幹小妍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的田野筆記。

註52 「...三樓那一層，有一個法務辦公室，很大。法務室門口就是很大一個鐵門，把它鎖住，看了就像關監獄一樣，鎖住的耶！一根一根，鐵的欄竿。我在想是怕人偷(法律文件)，怕安全問題吧。因為沒有門鈴，我們就在門口打電話，有個女生出來，拿了鑰匙，就把鐵門打開。我們進去，她就把鐵門鎖上。我一進去，就嚇到。它是廠房式的，卻不放機器，而是全部放桌子。就是一長排，好長，像籃球場那麼大的地方。桌子就這樣：一個一個，密密麻麻排一排，像小學的課桌椅一樣，這樣排一長排。那樣的法務辦公室肯定有文件啊！桌上全部是文件，[人]就淹沒在裡面...很可怕。她說：‘這個還是好的。因為上面只有它們一層樓，下面都是吃的，比較輕鬆。有的是一整層都這樣子喔，每一層都這樣子。’我說好恐怖喔，難怪效率這麼低。」以上是富士康已離職陸幹小妍的訪談口述，內容引自趙慧琳的田野筆記。

註53 富士康已離職陸幹小妍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的田野筆記。

註54 富士康已離職陸幹小妍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的田野筆記。

註55 富士康已離職陸幹小妍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的田野筆記。

註56 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門戶，向來以製造業取勝。如今，特區政府基於城市產業轉型的發展思維，重新擬定這一個區域的城市規劃方向。深圳治理者樂見富士康代工部門內遷，一併帶走龐大數量的底層製造業工人(主要留下它的研發部門)。地方當局預期，將隨著代工大廠回流內陸省份的深圳農民工，在城鄉二元化的僵固制度下，迄今仍是城市暫住戶口。他(她)們不是深圳市民，從來不屬於市府編列公共預算的服務對象。

註57 本段引自 Pun Ngai and Lu Huilin,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原文 2010 年 7 月線上發表於《Modern China》；以及盧暉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勞資關係與社會和諧學術研討會論文，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與學術研究主辦，安徽黃山，

2011年11月5日。該文作者認為，即便龐大數量的農民進城，成為世界工廠廉價的勞動力，也僅止於職業上的轉換，他(她)們作為擁有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小生產者，還必須仰賴農村裡的生活資料，如此農民身份的基本設計，不曾改變。對中國新的勞動階級而言，工業化和都市化，兩者是高度分離(disconnected)的歷程，眾多農民工被剝奪了在工作城市裡生活的權利。農民工還不是城市工人，資本雇用他(她)們，成為沿海城市從事製造業生產的底層勞動力，卻不需要支付跟城市工人同等的薪資；農民工也依舊無法取得正式的都市服務。這個扭曲現實的農民工制度，正符合了國家追求經濟成長，以及資本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兩大目標，是該制度得以持續存在的政治經濟因素。

註58 主流的中國城中村論述，認為原住民搶建「違章建築」，大舉進入房地產出租市場，肇因於政府為著開發建設，低價大量徵收農地，讓他們成為無法繼續以農業生產謀生的「失地農民」。再者，龐大暫住人口的居住需求，使得流動進城的農民工們，構成不小規模的租房市場，失地農民乘勢轉型為都市中的「食利階層」。也有學者另類解讀，城中村出租屋正是失地農民對於國家強徵土地的一項集體抵抗策略。總括來說，城中村出租屋是由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共構出來，活躍於自由租賃市場的都市非正式工人住房。

註59 我們現地調查後的以下記述，呼應了這樣分析：「村內閒逛時，遇見一位來自廣州的大哥，他手持一個出租房廣告的木招牌，以為我們要找房子，和我們搖搖頭，說都已經租出去了，沒有空房。我宣稱自己是台灣來的，到深圳龍華探訪朋友，也想了解村內投資情況，遂稍稍攀談起來。他很和氣，說自己是來投資的，幾年前以一百多萬的價格和原村民買地，拆了原來房子，再投入一百多萬建起目前高達八層、帶有電梯的大樓，每一層有十二個單間或一房一廳的單位，每個單位出租為月租六百元。他說這投資還可以，畢竟村內出租需求大。不過，根據其他的訪談來看，如同他這樣連租務都自己經手的投資者／房東，屬於少數。多半房東會委託給住在村內的原居民或熟悉環境的老租客來協助租金、租務，也就是所謂的「二[手]房東」。以上引自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60 用來證明權利的「綠本」，可以證明房子是你的[所有權]，是深圳處理違建房的過渡性作法。

它們一旦擁有綠本，基本上就不同於之前的違建房，但是還不能一步到位地換成「紅本」。

註61 水斗富豪新村老租戶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62 本研究舉證清湖片區內，分為東、西村的清湖新村出租屋，總計不下兩百棟，全部以「現狀保留」方式劃入了「四類居住用地」；反倒是七百年歷史的老村，近三分之二面積都被劃入了「舊村改造」的區段。老村尚存的三分之一，雖劃定為「文物保護用地」，屬「區級古村落保護區」，卻只有廖氏宗祠和「三界廟」，具不可移動文物的法定地位(可獲得官方明確的保護)。簡言之，官方城市規劃所透露出來的當地城中村改造風向，是要改造「非違建」的大部份舊村。至於新村內高密度集聚的「違建」出租屋群，則一律承認為「現狀保留」的住宅區。即使它們離就地合法，還有不小一段距離，卻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官方間接的許可與默認。

註63 清湖老村租戶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64 清湖老村租戶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65 清湖老村租戶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66 清湖老村租戶的訪談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67 我們訪談過的清湖老村租戶，打工類型包括小廠作業員(或技術工)、廢品回收、(水果或小吃)流動攤販、小餐飲店、保全、三輪車夫、修繕零工、水電零工、清潔工、二手房東、市場攤位、網絡出租屋網管，餐廳洗碗工和修腳踏車等。老村租戶們初始進城年代，可上溯二十年前；老鄉之間因此形成綿密社群網絡，且在空間形構較為開放、友善的老村聚落內，約略形構出河南人、湖南人、湖北人和四川人等不同省籍打工者的特定空間群簇。「以前富士康只招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現在才放寬到十六歲到四十五歲。」住在老村的更弱勢農民工，多為中壯以上年紀。他(她)們早年進城時，並不符合富士康的招工資格，只能進入工資更低小廠工作，或者在非正式部門謀生。

註68 楊友仁提出的「打工體制」，指涉作用在不同尺度上，影響著打工者社會經濟生活的城鄉差距、勞動力市場、戶籍制度與工廠體制(factor regime)。參考並引用自楊友仁(2011)，「流動與疏離：深圳富士康農民工的都市狀態」，流動

議題與兩岸社會研討會論文，2011年9月2-3日。根據楊友仁的調查，富士康普工在深圳成家落戶的門檻非常高，約是其平均收入的四倍。他同時指出，農民進城打工，脫離原鄉及親友網絡的社會連帶(social tie)，在外地遭遇到孤寂與疏離，富士康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因而出現了社會互動的斷裂，某個程度是「疏離都市狀態」。

註69 根據楊友仁的分析，高額房價，以及非城市戶口對於打工者子女教育資源的限制，如此雙重阻礙使得富士康農民工難以在深圳落地生根，也導致了已婚生子的打工者，大部份家庭分隔兩地，普遍存在「深圳獨身」的情況。

註70 我們在城中村的出租屋巷弄中觀察到的非正式娛樂場所，還包括了棋室以及「黑網吧」轉型後的網絡出租屋等。

註71 這段話是富士康女工筱昀的口述，引自趙慧琳、黃舒楣的田野筆記。

註72 以下是美美口述，城中村一日生活的空間移動：「寶寶早上[一睡醒就要抱她]下樓，十點回。她前陣子拉肚子，睡早起早，所以是早上7點到10點，上來[再]睡。中午12點，第二次下去，吃完[午]飯上樓。下午2點半又再下去，一直待到傍晚6點多。到[富士康]廠裡的「東門」(註：她口中的「東門」實為南二門)接她爸爸。時間難磨，在巷道裡逛來逛去。傍晚6點多，先推[嬰兒]車到南[大]門，7點再往『東門』走，接我老公。晚上7點40分，他才下工。」

註73 追溯水斗富豪新村最初的空間營造，並非未經規劃。筱昀說：「聽說那時候規劃房子後，還有籃球場，有綠化帶，有一條路...。」那是城鄉移民的急遽成長，帶動了工人住房的迫切需求，使得它公共建設的原始構想，終究無法實現。

註74 夏鑄九「再論設計與社會變遷」(An Elaboration of Design and Social Change)一文，P.13，引用日本愛知產業大學延藤安弘教授論點，指出不僅限於日本的傳統住宅，也會在其他的文化與社會中存在，都可以視為是具有「緣側」性格的元素。「緣側」的關鍵意義是人，當屋主有意款待外人，與人們溝通，室內室外互動，遂造就了「緣側」的多樣性，聯繫人與人互動的社區感與公共性，造就了人們聚居或是都市生活中最可貴的部分。以我們調查的富豪新村為例，出租屋巷弄具有無需人車爭道的優勢，為原本皆陌生人的租戶社群，提供

了展開社會連結所需的空間環境。當然，那兒不光是戶外與室內過渡的邊境。它更是一個高度政治敏感的公私交界，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對話，或者是彼此交戰的緊張關係，都可能在那樣的流動邊界上複製。

註75 楊友仁的相關研究(參照「流動與疏離：深圳富士康農民工的都市狀態」一文，p.29)，將受訪富士康勞工口語形容的「瞎逛」一詞，解讀為像是「放風中的無產階級(proletariat)」，就像監獄固定時間會讓犯人出來透透氣，在侷限的空間裡走一走，動一動，看看人，偶而可以抽根菸，自由地吸口空氣，避免悶壞，也讓監獄體制容易治理。按本團隊對城中村的空間觀察，此詮釋某種程度符合富士康移工家庭的成員自述「走來走去」或「逛來逛去」的原初情境。不過我們推斷，不同居住狀況的富士康勞工(及家屬)，在不同時間與空間條件下的「瞎逛」，是有不同意含。比如我們所觀察到，租房者在城中村巷弄中一開始的「瞎逛」，卻可演變為同鄉社群的彼此指認。他(她)們作為行動者，即使原意只是「瞎逛」，短暫逃離租房空間的侷限，但是並不能排除其最終重新展開社會連結的可能。

註76 從下列的黃舒楣田野筆記，可以窺知美美在水斗富豪新村的日常消費經驗，並非停留在陌生人之間的買賣。「走在村內，美美指認了四、五處小店或攤販，都是她的老鄉或朋友。有一個四川大姊，藉著店面前擺賣滷味，月付租金一千元，她對美美很照顧，美美喚她作姊姊。美美還說起一對江西姊妹，因為爭開分店賣水果造成競爭，鬧得兩姊妹不說話，很不愉快。她又說起同鄉來的姊妹開了一間小店，租金一萬多，賣兒童服裝，衣服是廣州半價批來的。但是即使相熟，賣給他也還是會賺一些，她常常還是寧願在另一間常有伍折的商店買。」

註77 「統建房」是計畫經濟時代產物。過去土地集體擁有，針對特定福利體系(國營工廠)或村的房屋需求而共同發展。現在興建的統建房，則多透過村委機制發展，在還沒有完全「城市化」(土地還沒有完全由「集體擁有」轉為「國有」)的地方才多見。有些說法視之為違建。因為村的資本不足，通常會和發展商合作。理論上，發展商獲得不超過3%的利益。統建房需以村居民為主，一般會宣稱保留四分之三給村民，僅出售四分之一。統建房購買者也只有使用權，不能上市交易，也不能拿去抵押貸款。統建房的土地還是集體擁有，但可拿到證明權

利的「綠本」，證明房子是你的。這是深圳處理違建房的過渡作法，但是還不能一步到位換成「紅本」。不過只要有綠本，基本上就不同於之前的違建房。以上說明引自黃舒楣的整理資料。

- 註78 前述在油富開設有專賣店的特步球鞋，也進到了清湖新舊村的農民工生活圈。清湖村外圍、富士康勞工被陸續移走的國鴻宿舍，早就將面向梅龍大道旁的一、二樓門面空間，規劃為新的購物商場。富士康龍華廠區北大門外的萬盛商場，則是幾年前，當地村委在集體土地上進行的商業開發。清湖村委是投資者，將那兒營建為住商混合的購物商場兼宿舍樓；村委也是商場營業空間招商外租的經營管理者。這個新興購物中心已招商特步、貴人鳥體育、Peak、Nokia、賽博數碼生活館和 Holpe (恆波)等針對年輕族群的品牌店進駐。樓上是富士康女舍(「百花園」)的萬盛商場，更針對女工消費商機，引進多家少女流行商品店，包括「菲兒飾品」、「女孩心飾」和「兩佳」連鎖專賣店等都進來了。當然，它即使有別於過去城中村以雜牌為主的生活消費，這些進駐的流行品牌，仍鮮少是國際品牌，它們帶來的，依舊是一種相對的高級化。
- 註79 進城農民工的日常生活，和都市新中產階級的生活消費水平，落差頗大，他(她)們落腳的地方，因而衍生出規劃死角的都市邊陲，是基層國土規劃部門眼中，現代化城市發展的絆腳石。於是在地方公權力逕行介入，大舉改造特定城中村環境以前，技術官僚們仍可先行透過較大尺度的城市規劃，決策及誘導區段發展的新方向。它一旦帶動城中村周邊的房地產市場，使得區段生活消費開始高級化，那麼普遍充斥著非正式經濟的城中村，即使不可能一步到位，展開全面性改造，也不得不被「鼓勵」朝向正式化發展。
- 註80 引自本團隊成員趙慧琳在 2010 年 7 月下旬，在龍華廠區周圍城中村首次進行工人訪談的田野筆記。
- 註81 以下是這名工程師親歷的廠內醫療實況：「[龍華]廠區裡面的醫院太小，看病可能從早上八點要排到十點，排得太久...。廠區「衛生站」是固定有醫生[包括全科、鼻科等]，感冒等小病多，一科只有一、兩位醫生。員工生病一般是自己買點藥；想去「衛生站」看，是沒有時間，也排不到。以前，工廠還有簡易藥品可以領，這樣的措施現在也沒有了。」

註82 西門伍屋村有著類似情形；南門附近的水斗富豪新村內，也只有在 2011 年新開設了一家婦科診所。彷彿和人工流產有關的婦科，才可形成足夠的醫療「商機」，居民的其它科別醫療需求，卻都達不到相當利潤水平似的。至於上述城中村附近「社康中心」的設置，則比較像是簡易設施的公共衛生站。

註83 比如龍華廠區西門及南門一帶，工人非正式住房的出租屋密集供給的周圍城中村，包括伍屋、瓦窯排、水斗富豪新村、共和和上下油松等，在過去行政區域的劃分上，皆屬於龍華鎮的油松村範圍。在迄今的都市發展中，上述城中村中租住的流動人口，從上萬到兩三萬皆有，然而整個油松，就只有一所公立小學—松和小學的設置。松和小學一個年級只有六班，以一班五十多人計算，全校學生近兩千人，其中數百名就讀的孩子是富士康員工子弟。然而富豪新村的十多年老租戶卻表示，「基本上沒戶口，小學進不去。很難。人太多。松和[小學]有提供富士康子弟固定名額，[但條件必須是]級別十四，兩個皆在富士康上班。要手續達到才能進去。一般花高價，也不能進去，沒有關係，想都別想。至於私立小學，扣除房租、生活、交通、電訊，小孩讀書剩多少錢？小孩讀書是大難題。」

註84 這是富士康內遷分流以前的統計數據。

註85 本資料引自余映嫻和董彥希的田野筆記。

註86 慶幸的是，隔壁伍屋村的幼兒園剛剛開張了。不過這位廣西婆婆還是感嘆：「不知道[為什麼]，[跟伍屋村]連在一起的瓦窯排，一家幼兒園都沒有。本來，這個地方沒人開。我們沒上學。要開車子拉到別地方去讀。[伍屋村幼兒園]從 2-8 歲都可就讀，打工的孩子也可以去，什麼地方人都可以，就是學費貴啊！這是私人開的，不是政府辦的，一個學期(註：應是每個月)學費兩千元(註：本團隊調查到的學費額度，有的是比她說的還要高)，一天三到四餐，書包、補習費...，加起來[每個月]還要五百元。好多人送不起，送回老鄉去。好多人就這樣，要看看孩子，又付不起學費。好多人分兩地，看不到小孩。父母不在身邊，不好教育啊，但是學費那麼貴，付不起。」

註87 當初是由在崗頭設廠的台資「甦立」塑膠工廠老闆，跟清湖村委租下這塊村集體土地，出資經營「清湖幼兒園」，並且有台灣康軒文教事業提供了實驗性的幼教內容。據悉當時此幼兒園只收 150 名園生，每個月學費高達 8500 人

民幣，主要供給那一帶台、日企業及附近工廠管理階層的子弟就讀。怎料經營幾年後，「甦立」倒閉，老闆在台灣被通緝入監。於是這座幼兒園經地方教育單位介入協調，轉而由清湖村委接手營運。

註88 2011 年度 富士康雙薪的筱昀移工家庭財務分析簡表(製表：趙慧琳，表內數據以人民幣計。)

每月收入			每月支出
筱昀月薪 2300	老公月薪 6000	小麻將間 營收 *生意淡： 1000 (和店租、 水電支出 打平，勉強 維持。) *生意旺： 4000	兩房兩廳房租+水電 1000
			小麻將間門面+水電 900-1000
			幼兒園學費 (每學期) 4000 (若每月均攤，估計約 1000)
			長沙購屋的每個月房 貸 3000
			(4 成人+2 小孩)吃用 等其它生活消費 2000
共計：雙薪 8300+小麻將 間營收(1000-4000)			8000

註89 本文作為個案經驗研究的一份調查報告，深知和分析性理論對話的重要性。作者同時省思，相關都市理論多是西方學術建構的歷史產物，若依循理論文獻回顧的慣例，讓這些抽象概念先行於我們田野經驗資料的呈現，恐更強化這些理論的支配性（即使儘量不落入理論套用的巢臼，仍容易受其框架而失落了研究文本的主體性）。這是我們決定將這樣的章節置放在末尾結論之前的緣由。

註90 本章節有關柯司特(Manuel Castells)都市理論中“集體消費”概念的進一步詮釋，參考：Castells, Manuel (1977). *The Urban Question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Saunders, Peter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2nd edition, London: Unwin Hyman).

註91 本段落對都市危機動員與都市社會運動的關連分析，參考自柯司特：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California: Edward Arnold. Introduction, pp. xv-xxi。

註92 參考 Graham, Stephen & Marvin, Simon (2001).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London: Routledge.

註93 這可以呼應潘毅與盧暉臨在“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一文中(《Modern China》, 36(5), p.514)所指出，二代農民工作為新勞動階級的主體，如今起而反抗中國特有的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逐底競賽(race-to-the-bottom)的全球生產策略，連根拔起的城市經驗，以及他(她)們的準(quasi)民工認同。二代農民工作為中國新的勞動階級，不僅表達出自我感與憤怒，更在日常生活與集體行動中，實踐他(她)們的抵抗。